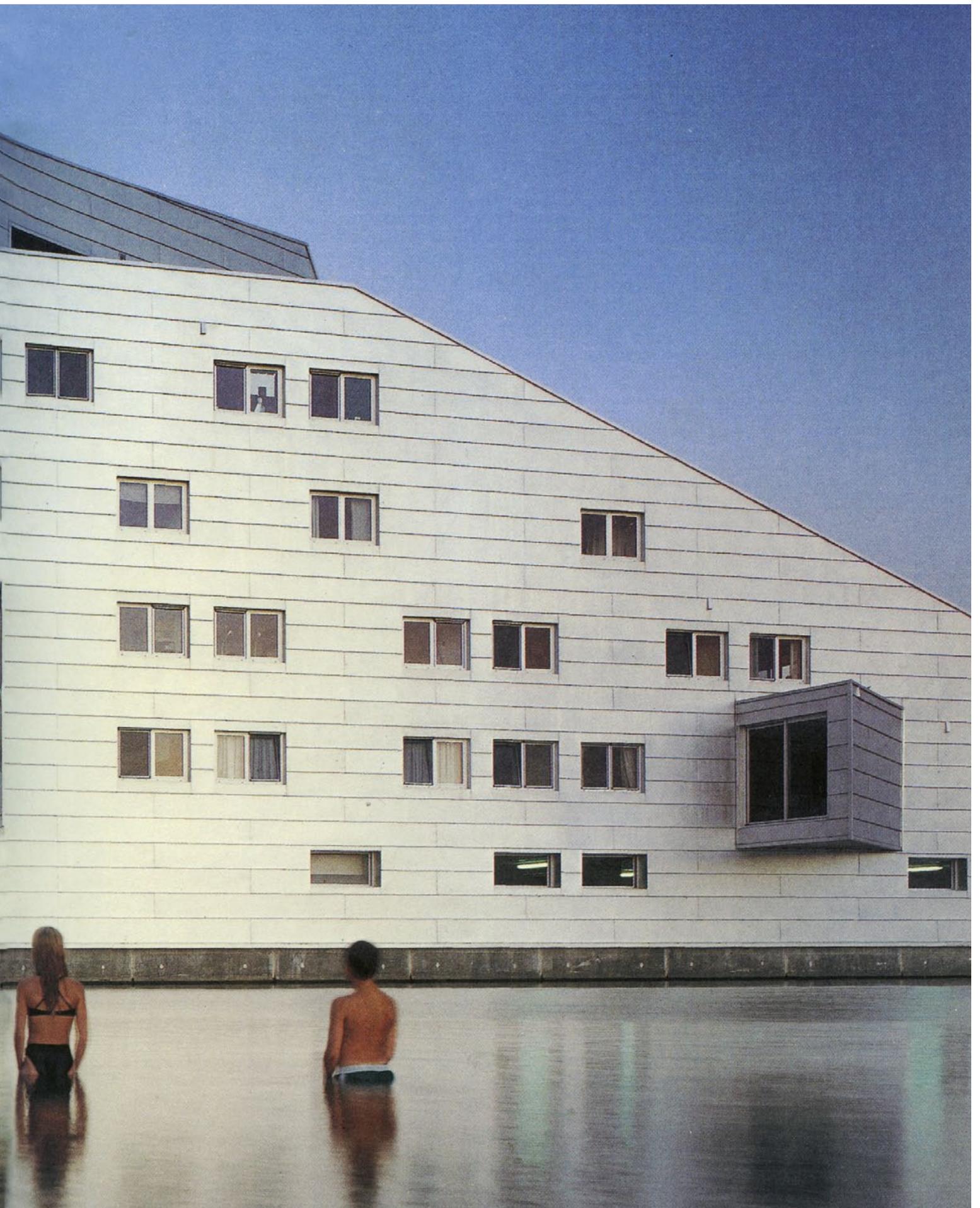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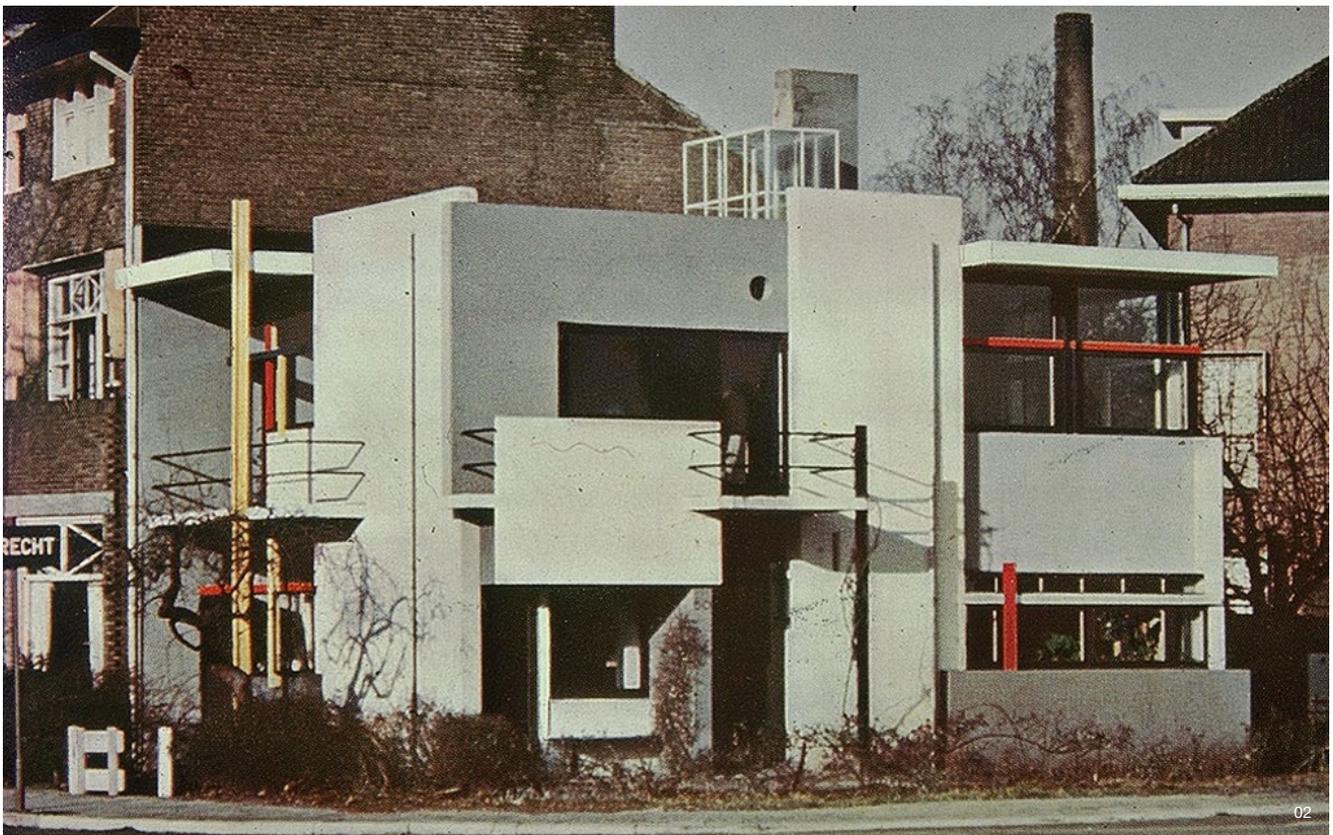


图为Neutelings Riedijk建筑事务所设计的湖边住宅“斯芬克斯”。五幢锥形建筑并立湖边，每幢内含13套公寓。向海的垂直立面提供了良好的视野，背后的坡状造型保证了充足的采光。荷兰，赫伊曾市，2003年建成





01. 贝尔拉赫设计的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没有用历史式样，没有刻意增加建筑装饰，没有强调外立面，而是注重内部空间，形式反映构造特质，并呈现比例与规模的美感，戏剧性地突破了19世纪末的建筑样式。阿姆斯特丹，1903年建成 02. 由里特维德设计的施罗德住宅是风格派建筑的标志，被意大利建筑理论家布鲁诺·赛维称作“一个新造型主义诗歌的结晶”。荷兰风格派发源于20世纪初，前后延宕不过十余年，却成为现代主义设计运动的发端之一。荷兰，乌得勒支市，1924年建成 03. 贝尔拉赫设计的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内部。贝尔拉赫信仰共产主义，相信资本主义性质的证券交易所维持不久，故而给证券交易所设计了宽敞的室内空间，打算日后作为市民活动场所，现在这里成为了一个音乐厅，与他的初衷不谋而合

# PLAYGROUND OF NETHERLANDS ARCHITECTURE

## 尼德兰造屋工厂

撰文\_文泽尔 编辑\_2话不说

### 社会住房

荷兰作为欧洲发达国家的国运，起自大航海时代的郁金香贸易和银行业。17世纪中叶，航海贸易最鼎盛时期，往返五大洲的总计两万多艘船只中，近八成挂了尼德兰国旗，人口理所当然呈现大繁荣，殖民地遍布全球。荷兰王国本土位于亚欧大陆桥起始处，强邻环立，整体海拔低于海平面，土地资源匮乏。如今漫步阿姆斯特丹老城街头，随处可见立面极窄的旧式民居，宽不过两三米，却一连向上建造四五层，层高十分有限，木质楼梯仅可供单人侧身通行，室内空间压抑得使人喘不过气。皇帝运河边的民居，一栋栋层叠起来犹如沙丁鱼罐头，便是当时普通荷兰居民居住状况拥挤的例证。

经过英法在海上与陆路的洗掠，荷兰成为一个小国，但拥挤依旧。19世纪下半叶，机器大生产使劳动力进一步向城市集中。如此历史大背景下，不难理解为何现代主义会选择在荷兰生根发芽。现代主义建筑的主旨，就是深入普罗大众，解决工业革命带来的各种城市问题。20世纪初，为改善劳工阶层居住现状，政府制定并实施了《住房法》，建立社会住房政策（社会住房指政府直接兴建、补助兴建或民间拥有之适合房屋，采用只租不卖模式以低于市场价格租给有需求民众）、补贴建筑公司、鼓励创新设计，现代荷兰建筑旋即蓬勃发展。

实际上，早在17世纪，现实主义大师伦勃朗便已预言了荷兰建筑与公共关系间纠缠互进的长期关系：明暗法在方法论上而言，是以简化催生联想，创造出更进一步的真实。战前荷兰建筑的三大学派，同样秉承这一方法论，作为设计宗旨。20世纪早期荷兰建筑文化的最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各种理论与实践的重叠性。阿姆斯特丹学派受欧洲新艺术运动影响，强调细节精美，甚至超越整体功能性与结构有效性。阿姆斯特丹学派代表人物克萊克设计的“船屋”住宅综合体，使用红色与深棕色砖石、米黄色混凝土的色彩搭配来制造对建筑母题“船”的联想，入口处模仿船头形状，凸出为梭形——简化整体勾勒的方法，恰似伦勃朗的明暗法。浪漫主义地将建筑发展为现代雕塑，强调其对于城市肌理的装饰性，具有明确的意旨，这种非理性主张受到风格派的严厉批判。

不妨以风格派代表建筑、里特维德所设计的施罗德住宅为例，来理解风格派究竟是怎样一种主张：这是座由简洁混凝土砌块、大片玻璃、黑漆铸铁为外表皮材质，使用纯粹几何形体与单调色块来构筑形象的建筑，简直像是蒙德里安画作的三维版本。事实也是如此：风格派信仰的是艺术的超越，希望通过对现有建筑要素进行解体，糅合经济学、线性代数、卫生防疫与人体工学，推导求证出精准严苛的创作法则，以便于在未来建筑能够完全“去建筑师化”。值得注意的是，风格派并不是没有装饰性，而是将传统的建筑装饰理念一并升级为现代主义风格。奥德1925年在鹿特丹修建的基夫霍克工人新村，全部运用最基础的建材，唯一的装饰要素，只有带白色门框的红漆门。在使廉租房建设费用维持在极低水准的同时，依赖形式与色彩间的严格逻辑关系和象征性，致敬

工人阶级的热情，自精神层面对“廉价”达成了超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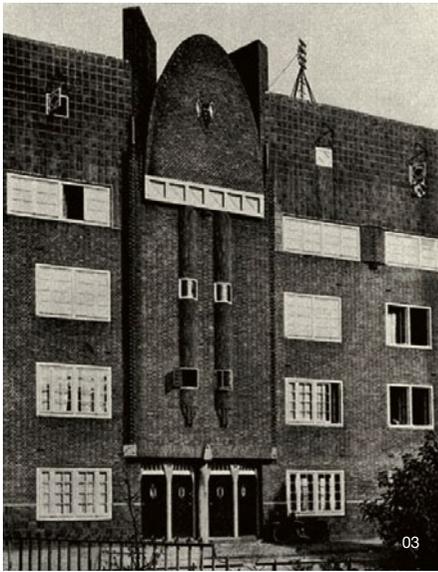
正是因为这种完全理性的特点，风格派建筑师最终几乎都转向了新客观主义，也即共产性质的集体主义建筑道路：无视个体特点，一切以体制化和标准化为优先。新客观主义与纪念性、个人崇拜等它原先所摒弃的要素结合，便形成了以纳粹德国和苏联为代表的集权式建筑。

这两个学派都宣称自己是荷兰现代建筑之父贝尔拉格的正统继承人。作为新艺术运动旗手，贝尔拉格的建筑哲学确实同时兼具浪漫主义和死理性派风格：他认为建筑材料与房屋结构应是时代技术水平与社会现状的映射，这种坚持本身即带有浪漫主义色彩。贝尔拉格所设计的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在结构和装饰上煞费苦心，将砖石这种传统材料运用到了极致，反而形成了一种全新风格。“船屋”在这方面与贝尔拉格的理念完全吻合。另一方面，风格派的超越论，也是贝尔拉格时刻强调的几何学与建筑构图比例系统的发展，只是忽略了象征性要素而已。以莫里列为代表的代尔夫特学派，观点沿袭浪漫主义而风格却趋近折衷，并不算新奇。

尽管荷兰的社会住房建设在战前便已取得了世所瞩目的成就，如今更是使荷兰成为欧洲住房匮乏率（Housing deprivation，指屋顶漏水、没有淋浴等条件较差的房屋）最低的国家。但不得不注意的是，即使是贝尔拉格本人，设计建筑时也并不太在意工人们在这种“大型艺术雕塑”里住得是否舒服，生活是否方便。1940年代编撰的政府档案显示，乌特勒支、海牙和阿姆斯特丹的荷兰劳动阶层在战前已拥有极高的住房满意度，这或许并不是因为那些房子住起来本身真的很舒服，而是由于政府依法给予了社会租赁住房完善的房租补贴，参考收入、当地租金、租户家庭组成等细节，让每个人都能够获得体面住房的结果。无论如何，战前现代主义公租房建筑，肯定比皇帝运河边的旧式民居省心得多。

时至今日，荷兰是世界上社会住房最普及的国家。鹿特丹和阿姆斯特丹的半数居民都居住在社会住房中，海牙和乌特勒支的社会住房租住率也分别有38%和35%。《住房法》颁布于1901年，经过120多年的积累与沉淀，每1000个人拥有138套公租房，以家庭单位来计算，接近四成荷兰人选择了租住社会住房生活。参考荷兰稳居全球前五的生活幸福指数，不难推知，社会住房政策的成功推行，正是荷兰成为高福利国家的坚实基础。





在荷兰，住宅不只是商品，还是基本人权。为改善劳工阶层的住宅情况，1901年政府通过了《住房法》，成立社会住宅协会并提供金融支持和法律保障。此后政府委托了大量公共住宅项目，鼓励创新设计，现代荷兰建筑旋即蓬勃发展。01. Kiefhoek 住宅项目，奥德设计，鹿特丹，1925-1929 02. Hatert 住宅项目，24H architecture建筑事务所，奈梅亨市，2011年建成 03. Spandammerplatoen住宅项目，Michel de Klerk设计，阿姆斯特丹，1913-1914 04. De Dageraad住宅项目，Michel de Klerk和Piet Kramer设计，阿姆斯特丹，1920-1923 05. 船屋住宅区，该建筑被视为20世纪早期表现主义建筑的里程碑，每一个细节都经过精心设计。Michel de Klerk设计，阿姆斯特丹，1917-1920 06. 船屋入口之一 07. 1930年左右，Vlugt和Brinkman设计了凡·尼尔公司位于鹿特丹的工厂建筑群，该建筑被认为是荷兰功能主义和理性主义最早的代表作。建筑总体布局依生产流程而设，各部分功能清晰明确，非常实用



07

## 新城

阿姆斯特丹人缅怀城市受到轰炸摧残时那段悲惨时光的方式，颇为特别。三条老运河沿岸的许多旧式民居被彻底炸毁，战后修复时，建筑师们并不照原样还原，而是选择使用混凝土表皮，在被彻底毁坏的民居旧址上盖起现代主义崭新住宅。这些住宅墙体统一为灰色，人们在路上行走时，路过漆得五颜六色、层层叠叠的窄旧民居时，冷不防就会出现一座深灰色的现代建筑，藏树于林，纪念性被彻底打散、融合到旧城肌理当中，仿佛历史延续过程中留下的伤痕，也同时强调了荷兰人务实、包容又开放的民族个性。

另一个城市鹿特丹就没那么幸运了。1940年5月，希特勒为迫使荷兰投降，下令对鹿特丹市进行地毯式战略轰炸。轰炸触燃港口油罐，引发不可收拾的大火，最终将整个鹿特丹城夷为平地，只剩下劳伦斯教堂的钟楼残垣。战后，鹿特丹积极开展重建工程。由于城市的旧肌理已经完全毁坏殆尽，新城市的建设反而能够毫无顾虑地进行规划，这一方面让鹿特丹成为新式建筑的试验田，另一方面也让城市本身的整体规划更具多样性。以范艾克、布洛姆和贝克马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建筑师跃上历史舞

台，更进一步让库哈斯、MVRDV事务所等当今建筑界巨星冉冉升起，同时为结构主义奠基。

所谓结构主义，乃是由索绪尔和列维斯特劳斯等大师领衔发展而成的一场思想运动。范艾克、贝克马、范登布鲁克等人组成的“Team 10”在鹿特丹重建过程中，以列维斯特劳斯在人类学上发展出的哲学思想为武器，批判功能城市异化等传统教条，强调人本主义。诸如中央管理保险公司大楼、“树型住宅”、阿姆斯特丹儿童之家等结构主义建筑，事实上都在找到“最小构件”后，将建筑按照自己设定的规则给模块化了。赫兹伯格甚至专门设置了一个网格来控制设计，更进一步造出“构造工具系统”。

结构主义所拥有的构件化与复制性等特点，在独特风格之外，大规模节约了建造成本。不止作为战后主流的结构主义，荷兰现代建筑自始至终都极为关注经济性问题，并将之上升到道德层面。荷兰新建筑的预算，往往只是欧洲其他地方的零头，法律上对建筑质量的要求也极为严苛。库哈斯曾公开抱怨，说人们不理解他对于“廉价”的执着。“研究怎样用尽可能少的钱，创造出尽可能多的功能，是非常有意思的。”



01/02. 17世纪初荷兰殖民者最先占领曼哈顿岛，将其命名为“新阿姆斯特丹”，仿照阿姆斯特丹布局建城，自此这个港口小镇开始繁荣，其后更名为纽约。图1为1649年阿姆斯特丹地图，图2为1660年新阿姆斯特丹地图 03/04/05. 1940年5月14日，希特勒为迫使荷兰投降，下令对鹿特丹发动地毯式轰炸。轰炸触燃港口油罐，引发不可收拾的大火，几乎将鹿特丹市中心夷为平地。战后，鹿特丹积极开始重建，成为新式建筑的实验场，并享有“现代建筑学教科书”的美誉。图3为鹿特丹新旧城市肌理的对比图。图4为1946年《Panorama》杂志刊登的鹿特丹被炸前后的对比照片。图5为今日鹿特丹，图正中大楼为库哈斯作品De Rotterdam



库哈斯将贝尔拉格看重的细部装饰性嘲讽为“引诱大众的小趣味”，但他并不知道，贝尔拉格生活的年代，因为阿姆斯特丹工匠竞争激烈，精细打磨细部也是很便宜的。无论如何，作为城市建设高度规划的世界级范例，这个填海造地已有800年历史、四分之一国土全靠填海得来的国家，近年来考虑海潮防护和环保，又选择要退滩还水，实施海洋工程计划。1960年代，受天然气经济与欧洲生育潮影响，荷兰人口再度激增，人口密度长期稳居欧洲第一。2014年，阿姆斯特丹市中心人口密度已超过东京。土地不再增加，农牧业高度工业化，往理性主义和中立立场的方向考虑，唯一能解决城市人口生存发展问题的方式，就是创造新城市。鹿特丹重建并非新城市个案，参考最先产生于荷兰的欧洲卫星城市规划，距离阿姆斯特丹市中心25公里远的阿尔梅勒，或许是个更好的例子。

阿尔梅勒原本是农业土地，区域内满是污泥，人迹罕至。现在已发展为荷兰十大城市之一，人口仍在疾速增长。最初，规划师们琢磨出一套可供未来规划者进行多次迭代的城区方案：设计5个核心区，每个核心区都有完整的城市结构。城市三分之一用于工业，三分之一居住，其余全是公园和开放空间。但这个城市的生活，却显得太过单调，年轻人需要电影院、酒吧、迪斯科舞厅和各种新奇的娱乐场所。1994年，阿尔梅勒从鹿特丹请来世所瞩目的天才建筑师库哈斯，这位建筑界的明星为阿尔梅勒创造了真正的市中心，精心安插高密度摩天大楼，勾勒出城市独一无二的天际线，并吸引一大批知名建筑师，重新耕耘这荷兰战后诞生的第二块建筑试验田：库哈斯的Utopolis电影院、妹岛和世与西泽

立卫的德昆斯特林剧院和文化中心，都成为观光客们前往完全没有任何历史文化沉淀新城市的动因。

阿尔梅勒的建筑开垦还在不断持续，MVRDV事务所为2022年的园博会设计了一个作为城市延伸的园区，并赋予其绿色城市的生态性，或者按照MVRDV创始人Winy Maas的说法，“一颗种子”——它最终会生长为一座全新的城市。

鹿特丹的城镇史接近千年，历史上曾几度毁于大火，又因其优越地理位置而屡获新生，再迎繁荣；反观阿尔梅勒，虽然是建造历史只有几十年的全新城市，本身却是为阿姆斯特丹本城的持续壮大而设置的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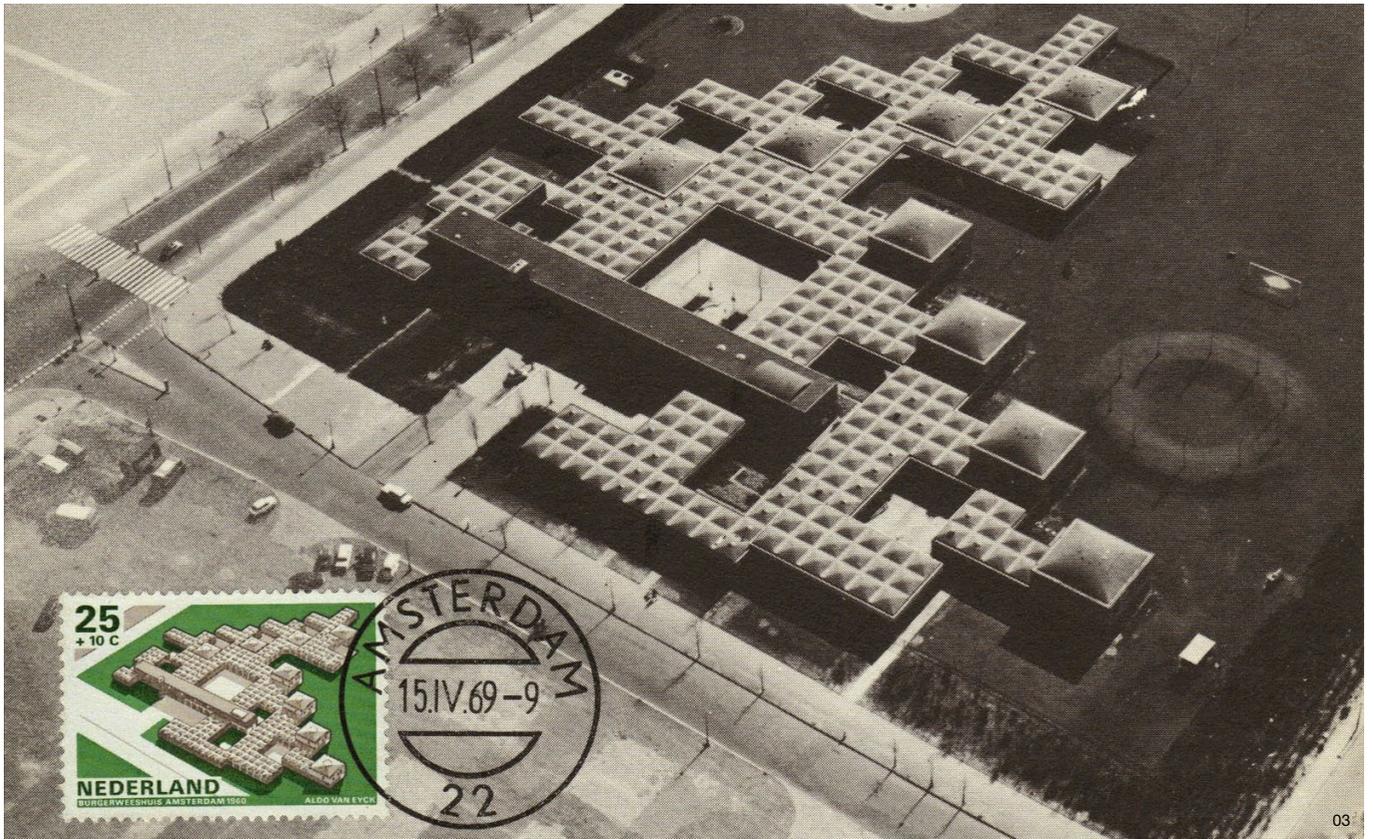




01



02



01. 结构主义主张巨大的建筑应由许多小的空间单元堆积而成，追求人性、亲切的尺寸与形式。比希尔中心办公大楼绝佳诠释了这一点，建筑师赫兹伯格以小的空间单元创造了一片群体的建筑系统，意图打破高层建筑造成的疏离感。荷兰，阿培尔顿市，1967-1972 02. 1928年国际现代建筑协会（CIAM）在瑞士成立，发起人包括柯布西耶、格罗皮乌斯等人。1933年CIAM通过了《雅典宪章》，标志着现代主义建筑在国际建筑界的统治。1956年，以荷兰建筑师范·艾克为首的一批协会内部的年轻建筑师公开质疑CIAM教条理念，并成立Team10小组，主张结构主义。图为范·艾克和其他Team10成员扯出大旗宣告CIAM已死 03. 阿姆斯特丹孤儿院（结构主义早期代表作）是范·艾克对其建筑理想的一次谨慎实现。建筑师构想以微型城市的形式建造一栋住宅，他以均等的方式重复单一的模块，再把它们巧妙相连。阿姆斯特丹，1955-1959

略新城，亦可看作历史名城新生出来的“触手”。彻底重建与造新，表面上似乎无甚区别，毕竟传统主义势力在鹿特丹的重建角力中早早落败，两个城市是在平等位置成为“荷兰性”的试验田；然而，从实际成果看，鹿特丹近年却似又有少许乡愁式的传统回归。毕竟，鹿特丹人所住的仍是他们祖先的土地，而阿尔梅勒就算离首都再近，也始终并非阿姆斯特丹吧。

## 全世界的荷兰房子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鹿特丹曾是欧洲的明星城市、建筑师的理想国。作为港口和工业重镇，对鹿特丹的重建，一度对荷兰的战后经济复苏起到过强心剂的作用。曾经，来自世界各国的建筑大师都来到鹿特丹、阿尔梅勒这样没有负担的战场，实践他们的乌托邦野心。然而，毕竟空间有限，在全球化已成常态的今天，鹿特丹所能容纳的新建筑数量已趋饱和，它在建筑界的试验田地位又开始式微。如今，崛起于荷兰的建筑明星们，和当年尼德兰王国“海上马车夫”的称号遥相呼应，顺理成章地向着全世界进军，展现他们一脉相承自大航海时代的建筑理念：理性主义核心之下，大胆创新，同时注重经济性。

库哈斯在他追溯曼哈顿都市沿革的著作《癫狂的纽约》中坦承自己是一

个没有国家的人，这也道出了当今荷兰设计师的普遍心声：他们是世界性的、不强调传统继承的勇敢开拓者。在讨论荷兰当代建筑时，“荷兰性”却是个被引用得越来越多的词汇。诚然，一个国家的建筑设计，本来也不可能只呈现出一种风格，但荷兰建筑是否具有明显“荷兰性”，却几乎是确立其身份的唯一标志。所谓“荷兰性”，主要还是源自作为现代主义建筑发端的影响——后现代主义未能在荷兰建筑界造成波澜，由强烈“现代性”主导的设计背景和方法论，因而成为“荷兰性”几乎唯一的表现方式和取之不竭的创意源泉。

鹿特丹著名设计师克罗威尔曾说，“只有依靠设计，才能使我们国家成为一个可以生存下去的地方。”由此，我们也就能够理解荷兰建筑师的征服欲望来自何方。妹岛和世曾评价库哈斯，说他的建筑因为一直专注于解决社会“激变”带来的问题，其身份已由单纯的建筑师，上升为“公共知识分子”——任何人都可以从他的作品中领略到自由。库哈斯革新了建筑学，并重新定义了社会生活的方式。

进入2000年之后，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压力使荷兰政府也更多参与到建筑界中来，政策上开始扶持成立大型事务所，鼓励建筑师们参与特大项目投标。诚然，这一系列政府行为一方面推动了“荷兰性”建筑在全球范围内更广泛地生根发芽，但由于需要采取更追逐利益的方式，设计



01



02

01. ING集团是荷兰最大，全球第20大金融集团，其总部大楼是个横向的大玻璃盒子，被人亲切地称为“吸尘器”。其不仅有良好的视野，更符合ING的经营理念“透明”。阿姆斯特丹，MVSA建筑事务所，1998-2002 02. OVERGOOI住宅，NEXT建筑事务所。荷兰，阿尔梅勒市，2008年建成 03. Y形大楼提案。对荷兰建筑师而言，造型不是目的，而是方法。受限于项目所在地的空间、采光、视野等各种因素，NL建筑事务所设计了弯曲的Y造型的办公大楼。阿姆斯特丹，1999 04. 二战后重建的鹿特丹曾以其独一无二的高楼文化成为荷兰最有特色的城市（1970-1980年代），如今这一优势已式微。Studio Marco Vermeulen和 Urban Affairs共同构想了未来的鹿特丹建筑的形态，它们不拘泥于建筑的语法，而是强调外形的象征力量，2003 05. 2008年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的主题是“盖房子之外的建筑”，图为荷兰NL建筑事务所的参展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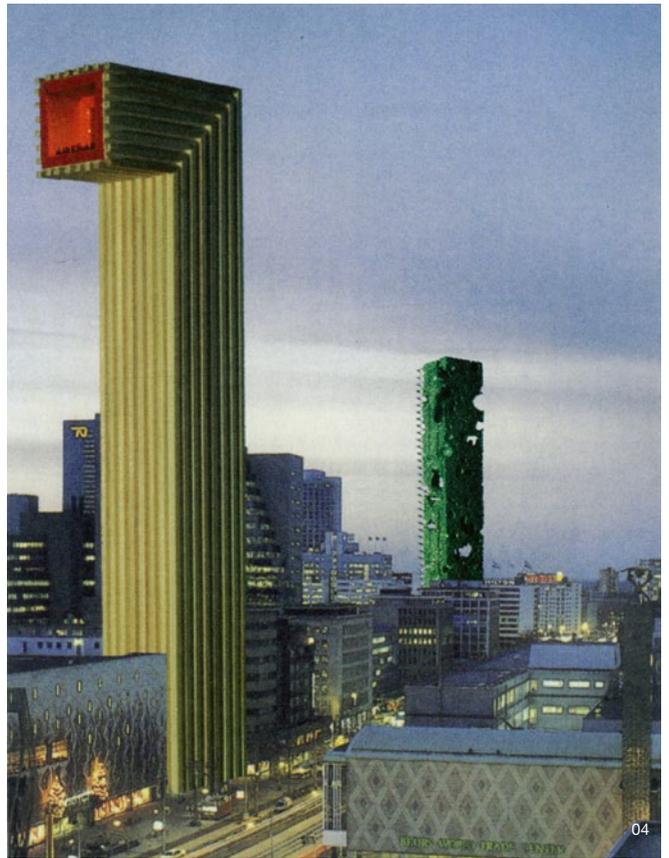


开始从阿姆斯特丹、鹿特丹、阿尔梅勒那种注重城市整体规划和经济性的方向，转为更重视视觉效果和建筑主调的格局，并同时给予合理性上的解释。换句话说——建筑的体量变得更大。这种变化又转而输送回本土，甚至造成当代建筑评论界对未来建筑方向的长期论战。

库哈斯的OMA事务所有很多这样的例子，CCTV央视大楼就是最典型的海外个例：最初的50亿工程预算一路飙升至近200亿，光是支付给OMA的设计费就高达3.5亿。这座斜跨式大楼倾覆力巨大，抗冲击破坏力存在争议，造型被嘲笑为“大裤衩”。尽管在美国获奖无数，却还是被认为是哗众取宠、建筑形式主义大于功能性的绝佳例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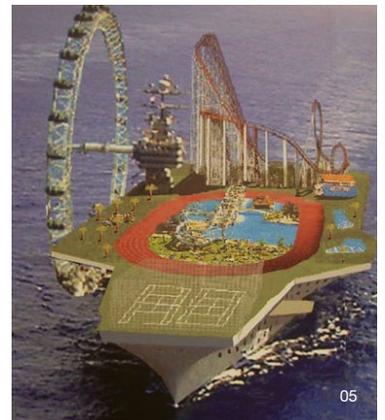
库哈斯和他的合伙人们似乎接受了这类批评，并在后继作品中积极加以改正：OMA的台北演艺中心制造了半露天的开放空间，体量较小，将传统夜市的食客空间和音乐厅欣赏音乐的空间有机融合在了一起。他们在本土为鹿特丹所修建的新市政厅，创造性地使用了模数化的空间组，在发扬结构主义传承的同时，用外表皮布光实现了未来感和城市肌理的和谐统一。

当年，建筑“女魔头”扎哈也曾是OMA的一员。她的参数化风格对建筑总造价的要求很高，与当年荷兰建筑的经济化主张南辕北辙，这或许也是她在OMA做了两年实习生，合伙几个月后就选择自立门户的原因。今年，扎哈的东京新国立竞技场方案因为体量过大、过分昂贵而被投票否决，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建筑界对于个人主义、风格化和好大喜功的反思。



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并没像评论家们所想的那样进行对决，他们在某种程度上选择了握手言和，“主义”的分界线在全球也变得模糊和宽容——不止建筑。MVRDV给西班牙红酒之乡Logrono设计了Montecorvo生态城。这个耗资不到4亿美元的城市开发项目由3000套“碳中和”房屋构成，光电电池、灰水循环和天然水净化等与自然融合的要素，是其理念核心。由Ben van Berkel和Caroline Bos领衔的UNStudio努力探索新技术和新方法，这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贝尔拉格“建筑反映时代”的理念。UNStudio为杭州设计的来福士广场，形象源自钱塘江大潮，双子楼主体营造出波浪的回旋感，“破浪”位置安置商业综合体、顶楼绿色庭院和游泳池。400米高的Peruri 88由MVRDV、Jerde Partnership和ARUP共同设计，作为雅加达的新地标，Peruri 88巧妙地让高密度与绿色空间需求统一，将摩天大楼升级为垂直城市：人们不必离开大楼，也能够满足生活在一座城市当中的一切需要。

总之，“海上马车夫”精神不死，荷兰建筑对世界的未来化改造还将持续。





**Woonhuis Bierings**  
Rocha Tombal Architecten  
乌特勒支, 2009



**Ing Bank**  
Alberts and Van Huut  
阿姆斯特丹, 1987



**ING Hoofdkantoor**  
Meyer en Van Schooten Architects (MVSA)  
阿姆斯特丹, 2002



**Intel Hotels Amsterdam-Zaandam**  
WAM architecten  
阿姆斯特丹, 2010



**WKK Energy Plant**  
Liesbeth van der Pol, Dok Architecten  
乌特勒支, 2005



**Cube-houses**  
Piet Blom  
鹿特丹, 1977



**Prinshof Veenman**  
Neutelings Riedijk  
埃德, 1997



**The Whale Housing**  
De Archeitecten Cie  
阿姆斯特丹, 2000



**Theatre Agora**  
UNSTUDIO  
莱利斯塔德, 2007



**Community School Het Spectrum**  
Architectenbureau Marlies Rohmer  
海牙, 2005



**Penthouse Las Palmas**  
Benthem Crouwel Architecten  
鹿特丹, 2008



**University of Groningen Faculty of Life Sciences**  
Rudy Uytenhaak  
格罗宁根, 2009

1990年代开始, 荷兰建筑经历了一个“黄金年代”, 以库哈斯为代表的一批荷兰建筑师逐渐在世界崭露头角, 被称为“超级荷兰一代”。他们最重要的成就并不在于炫目的建筑形式, 而是其基于研究的系统性设计方法。本页精选了24个荷兰建筑师的设计项目, 左页为荷兰本土项目, 右页为海外项目(感谢“之间”团队的数据梳理工作)



**Isbjergget**  
SeARCH  
丹麦, 奥尔胡斯, 2013



**Centre for Virtual Engineering**  
UN Studio  
德国, 斯图加特, 2012



**Crematorium Heimolen**  
KAAN  
比利时, Sint-Niklaas, 2008



**CCTV总部大楼**  
OMA  
北京, 2002-2012



**La Llotja Theatre and Conference Centre**  
Mecanoo  
西班牙, 莱利达, 2010



**武汉汉街万达广场**  
UN Studio  
武汉, 2013



**Fondazione Prada**  
OMA  
意大利, 米兰, 2015



**Seattle Central Library**  
OMA  
美国, 西雅图, 2004



**Hochschulcampus Osnabrück**  
Bentham Crowell  
德国, 奥斯纳布吕克, 2014



**Franz-liszt-Konzerthaus**  
Atelierkempethill  
奥地利, Raiding, 2005



**The Interlace**  
OMA  
新加坡, 2013



**Library of Birmingham**  
Mecanoo  
英国, 伯明翰, 2013



库哈斯, 2000年 photo by Wolfgang Tillmans

# REM KOOLHAA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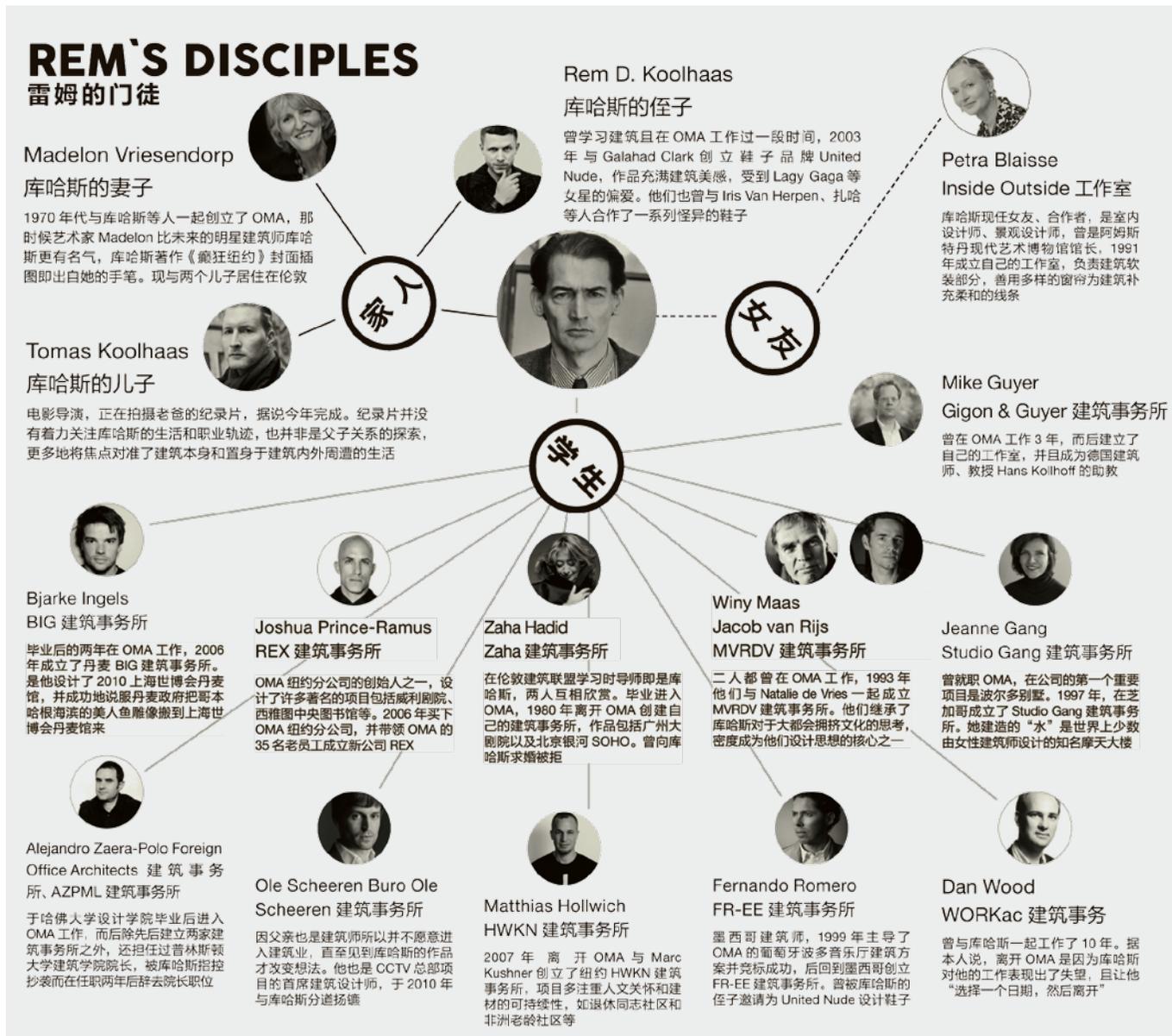
## 重读老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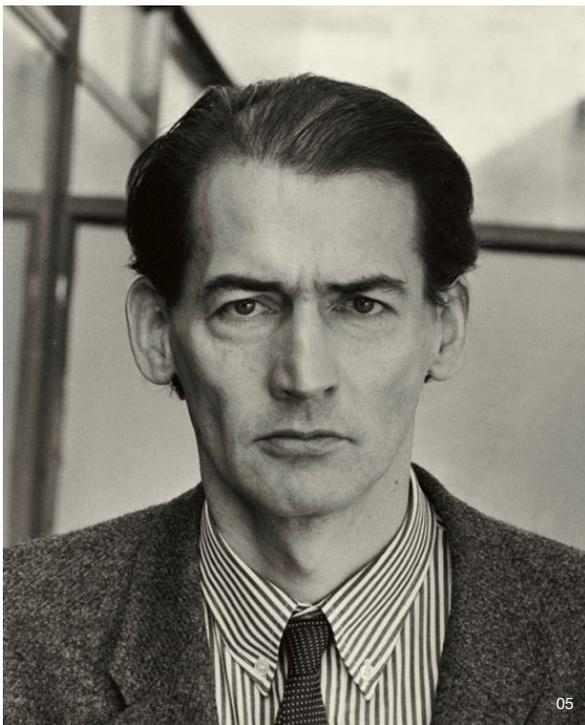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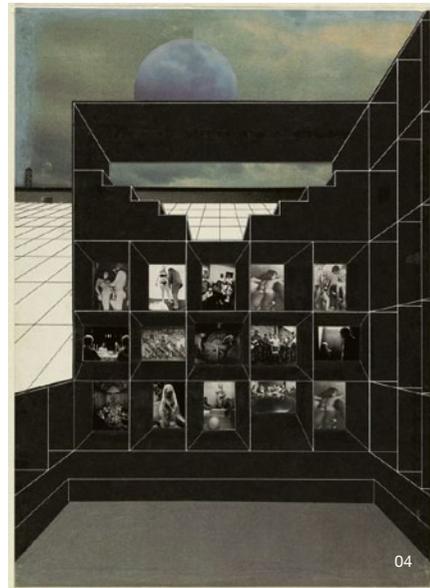
撰文\_姜珺 采访\_余非 翻译\_olaCola、许嘉 编辑\_2话不说 图表编辑\_2话不说、叶未青 图表设计\_许大才人

### 东与西

2011年初夏，莫斯科河畔。前苏联“红色十月”巧克力厂旧址上改建的一个旧厂房内人头攒动，“史翠卡（Strelka）媒体建筑与设计学院”正在为其第一届学生举行毕业典礼。透过主席台对面的观众席，可以看到对岸在未建成的苏维埃宫旧址上复建的救世主大教堂的金色穹顶。学院在全球聘请了十位导师，老库担任总指导，我是唯一来自亚洲的导师。轮到我们小组拍毕业照时，学生们按照各自出生的地理位置在主席台上一字排开，我和同组的一名意大利籍导师分别站在两头，对台下的老库招招手：“雷姆！这就是欧亚大陆了，你想站哪边？”他一个箭步冲上来站在我身边，“我选择亚洲。”

欧洲人库哈斯对亚洲的兴趣不是什么新闻。十多年前，他在纽约WTC（纽约世贸大厦）重建和北京CCTV两个招标之间做二选一时就选了中国；再早前的上世纪末，他在哈佛带领的城市研究计划首站选的也是中国。那是在新自由主义大行其道的1990年代后期，柏林墙已经倒下，而9·11尚未到来，西方社会普遍弥漫着一种世纪末的矛盾气息：一边是对共产主义“历史终结”的宏大凯旋，另一边是晚期资本主义歌舞升平背后的精神危机。当时，我曾用一个类似武器型号的缩写“RFK”来讨论西方末日论的三位一体，一个由乐队、小说/电影和建筑师构成的集合：“收音头”（Radiohead），《搏击会》（Fight Club）和库哈斯（Koolhaas）。“收音头”1997年的专辑《OK computer》是现实地獄风景的绝唱，人类在“没有惊喜”的安乐死中无力回天；1999年的





01.《癫狂纽约》(1978)是库哈斯的成名著作。该书与传统的建筑学研究方法保持距离,更是一本关于曼哈顿历史和文化的书。图为书中图片:1931年1月13日,布扎建筑师协会(Society of Beaux-Arts Architects)在纽约举行了一个舞会,几位著名建筑师扮成建筑表演节目 02.1963年,19岁的库哈斯开始在《海牙邮报》担任记者,5年后才转为学习建筑。记者的思考方式深深影响了库哈斯日后的工作理念。图为库哈斯当年的记者证 03/04.1972年,作为学生的库哈斯与建筑学讲师增西利斯合作设计了他在伦敦建筑联盟学院的毕业作品《逃亡,或成为建筑的志愿囚徒》。库哈斯假设将伦敦分为好的一部分和差的一部分,“差”伦敦的居民理所当然向“好”伦敦不断迁移,当局这时不得不在二者的边界上建立两堵高墙来阻止他们。这两堵高墙之间的城市空间内被分割成许多社区,可以满足人们各自的需求。最后,原本逃亡的人们自愿被囚禁于这样一个有着亲善外表的“监狱”中,正如它的标题所说:逃亡,或建筑的志愿囚徒 05.1987年的库哈斯 06.库哈斯和扎哈·哈迪德。哈迪德在伦敦建筑联盟学院与他的导师库哈斯相遇,两人互相欣赏。她毕业后也曾进入OMA工作 07.库哈斯的妻子Madelon Vriesendorp为《癫狂纽约》创作的插画

电影《搏击会》则虚构了一个通过搏击和自毁抵御身体异化的地下组织，最终泰勒·德顿（Tyler Durden）对资本主义金融中心的摧毁，某种程度上预演了两年后的9·11，而他中产革命者的形象则昭示了十年后以阿桑奇和斯诺登为代表的一代国家霸权挑战者；2000年，库哈斯获封主流建筑界的最高荣誉普利兹克奖，同时在非主流文本《垃圾空间》中却描绘了一个不同于《1984》的、“没有独裁的法西斯”场景：“尽管其个体部分为杰出发明的成果，为人类的智慧所精心策划……其集合拼写出的却是启蒙的终结，闹剧的复苏，一个低级的炼狱……”在我看来，RFK的灵魂相通来自于他们代表的白人精英对晚期资本主义的三种反省方式：延续、毁灭和再造；但考虑到三者的职业：“收音头”是与现实貌合神离的摇滚乐人，泰勒/杰克是一个兼职亚政治运动的办公室白领，而库哈斯则是一个全职建筑师——似乎正是三者 in 资本主义分工中从边缘到中心的位置决定了他们的思维方式和斗争策略，这种“屁股决定脑袋”的逻辑又多少不乏讽刺意味。

表面上看，RFK三者在生活轨迹上有着相似性：无休止的机场间旅行，几乎永远住在酒店，成天“忙着见人”，大量的“一次性朋友”……然而，库哈斯身上却既没有“收音头”的失落，也没有杰克的失败；他既不属于离经叛道的朋克，也不是个循规蹈矩的工作狂，但似乎又兼而有之：着正装却不打领带，手机藏在袜子里，擅于礼节性的问候但惜字如金，寥寥几句就直奔主题……库哈斯抵御异化的秘密藏在被他称为“回顾性宣言”的成名作《癫狂纽约》中：全书以“乐观主义战胜悲观主义”作结，**乐观主义并非个人天性，而是在悲观主义于事无补时的一种工具理性。**记得和库哈斯第一次见面时我们聊起海南，在听我讲完一个泡沫经济中诞生的“烂尾城”故事后，他问：“你对此是否感到悲观？”我摇头，“这无关悲观和乐观，我只是感到激动。”那一刻，我注意到他眼中闪起了感同身受的亮光。

上世纪末，当西方最好的一面和最坏的一面同时呈现之际，库哈斯将视野转向东方。他曾在《癫狂纽约》中写过一个寓言：在一个飘浮的游泳池中，一群苏联的先锋向着自己的方向游向对岸的美国。选择珠三角，如同向着西方的方向游向东方，然后发现那里正在实验西方的经验。这种选择部分靠的是对资本主义的经验，部分则是对社会主义的直觉。珠三角是社会主义河流面向资本主义海洋的出海口，在这条河流的源头依然是公有制、大型国有企业、五年计划，它们与私有制、跨国巨头、市场经济在沿海的相遇，只是一场更为宏大的政经体系改造的序幕，真正要理解中国，还需从出海口溯流而上，去接触特区实验背后的制定政策的上游，分析中国改革不同于西方新自由主义的根源，否则珠三角将无异于另一个唐人街，一个想象中的东方。

## 左与右

2007年，荷兰南部的一个小城，当地一家博物馆请我去主持一个驻地研究项目。了解到这家博物馆的主办方是一家有上百年历史的著名跨国化工企业后，我提出以之为对象研究大企业对小城市的影响。提案得到了批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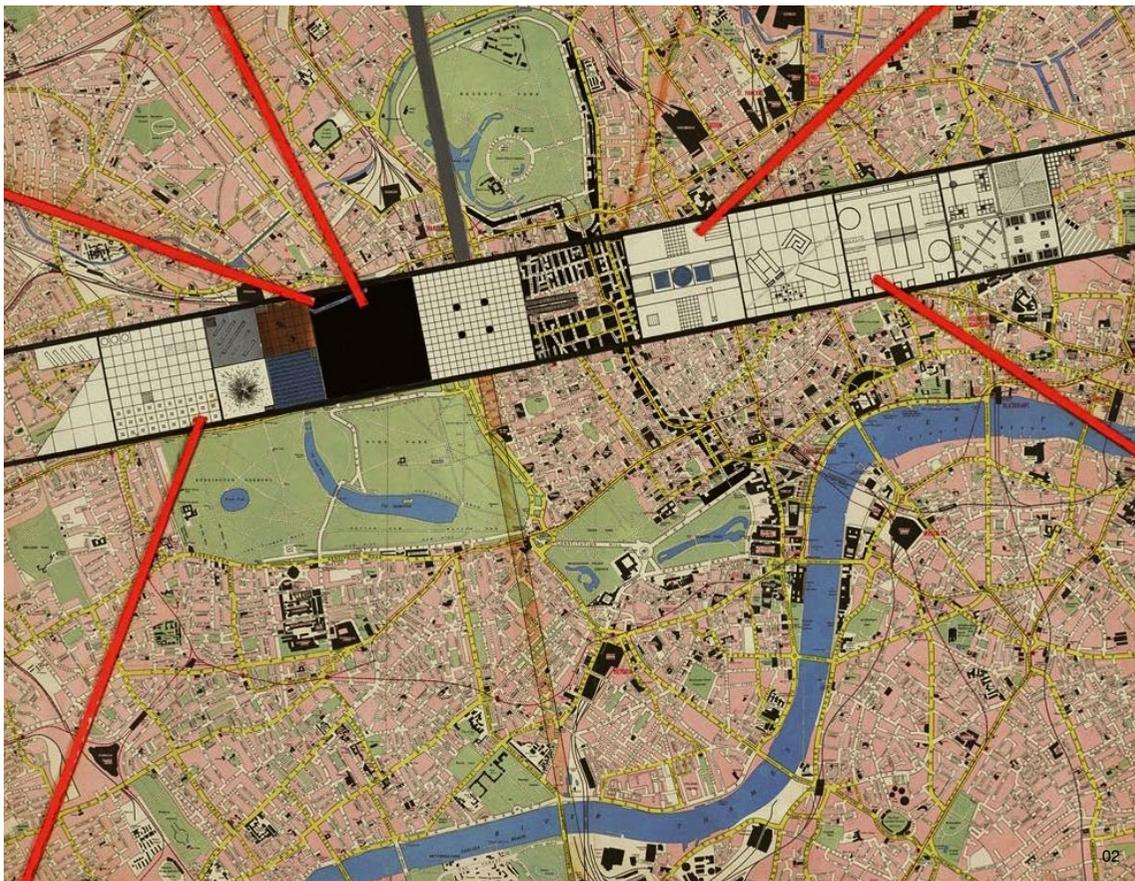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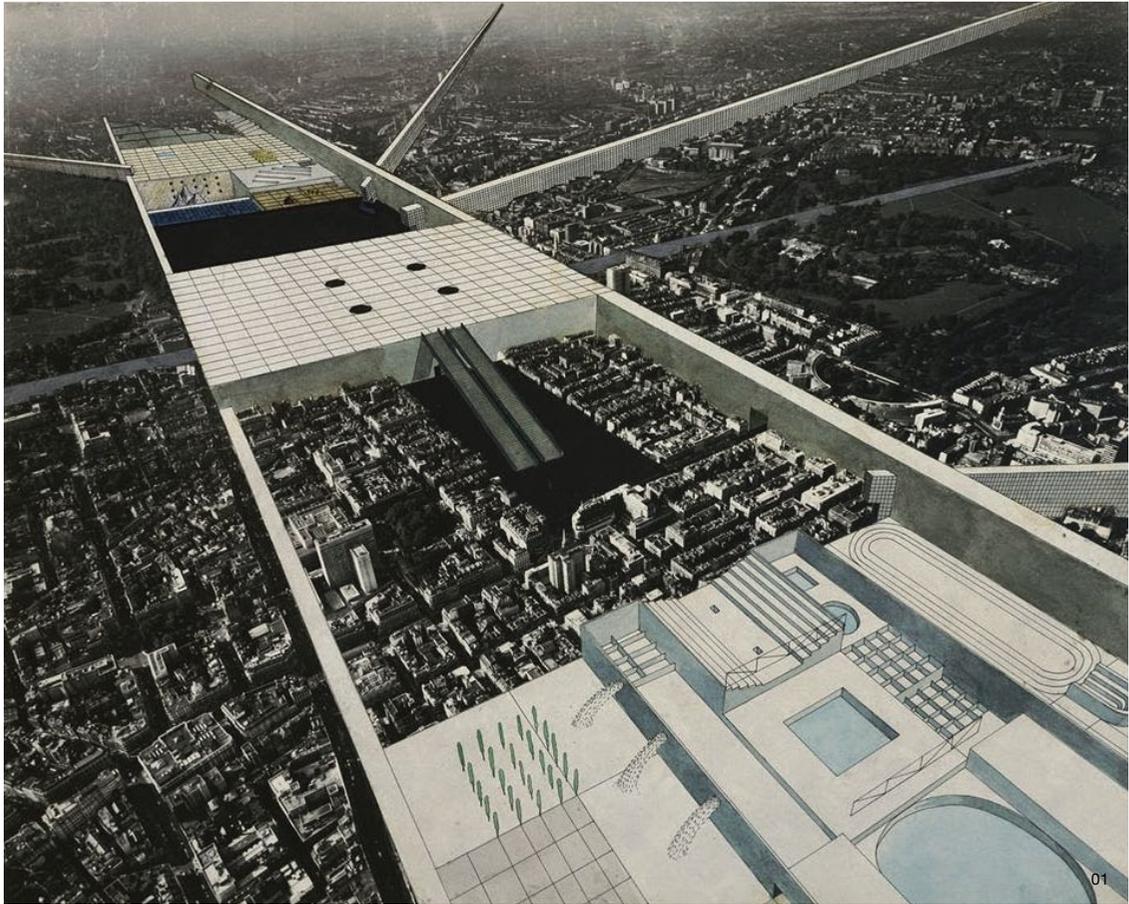
接待我的是这家企业公关部门的一位女主管。开始半小时的访谈很顺利，女主管笑脸盈盈应答如流，直到我问到这家企业一百年多前的一场矿难事故时，她突然变得很紧张，问我到底是艺术家还是记者，继而慌乱地中断了我们的谈话，几乎是强迫性地用最后一点礼节，把我请出了这家企业的总部大厦。我啼笑皆非地回到博物馆，那里正在展出一个中国青年艺术家的作品，策展人在导言中将之贴上了“反叛”的标签。主办企业“保守”的荷兰主管和眼前“反叛”的中国艺术，令我不禁重新审视起这个“公共空间”的意义。

如同西方人想象中的东方，对于大部分东方人而言，也有一个想象中的西方。在这个想象中，原始积累时期的野蛮生长已一去不复返，百年前的“强盗大亨”已变成了慈善家和谦谦君子；然而，有关超级企业的阴谋论依然不绝于耳，《搏击会》中的杰克是个在跨国汽车公司工作的召回协调员，他熟练地在车毁人亡的现场用荒诞的成本核算公式算计是否需要问题汽车进行召回……资本主义数百年的自我修正既没有结束周期性的危机，也没有涤除资本的贪婪，财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集中，全球化只是贫富差异日益加剧的半球化。改良还是革命？一个世纪前“英特纳雄耐尔”在欧洲分裂为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时，这一关于资本主义内在危机的分歧就已开始。泰勒·德顿无疑是个革命者，而且是后马克思主义者们期待的中产阶级革命者，一个自觉地将自己的财富归零、以贩卖人油肥皂（原料来自抽脂美容术后的人体脂肪，却可以被改造成自制炸弹——消费社会有关“自毁”和“再造”的观念艺术）为生的地下分子。当然，这类有产者革命的彻底性是值得怀疑的——当杰克发现泰勒只是自己意淫的完美自我时，他立刻恢复到他作为中产阶级的软弱本质，以自杀的方式“谋杀”了他的内在。杰克是那些代



表99%美国民众的办公室白领们的一个缩影，他们直到财富集中到1%时才以左翼运动名义走上街头，而一点小甜头就能把他们打发回家，成为这种制度“更健康、更快乐”的延续者。怀有“均贫富”梦想的泰勒·德顿毕竟只是虚构角色。

东方人往往只看到内在于西方的福利制度，却忽略其外在的全球霸权，而正是基于其“外部专政”，其“内部民主”才有条件建立。西方的经验建立在它作为工业化先行者对全球价值链上游的主导地位之上，而第三国际的实质是一个后发国家针对先发国家的垄断而另立的经济体系山头。第二国际最大的成就，是在第三国际的威胁下，通过提高社会福利和对工人阶级精英的行政吸纳，在西方工人阶级中建立起了乐观主义。社会福利可以把走上街头的民众打发回家，行政吸纳可以赋予他们主人翁的成就感，却都难以解决人被社会分工的异化。建立在物质和权力基础上的乐观主义是脆弱的：《搏击会》中杰克的失眠始于他生命中的每件事“都像是一张复印件的复印件的复印件”，而他在心理治疗小组聊以自慰的乐观主义，却又是无比悲观的“放弃希望即自由”。显然，这种绵软的、精神理疗式的乐观主义和库哈斯在《癫狂纽约》中所宣告的乐观主义大相径庭，如果把前者比作书中的塑料美杜莎之筏，后者就是先锋者们的钢铁游泳池，正是后者将前者切成了两半。作为记者，库哈斯更像左翼的革命派；而作为



01/02. 库哈斯毕业作品《逃亡，或成为建筑的志愿囚徒》 03. 库哈斯的妻子Madelon Vriesendorp为《癫狂纽约》创作的插画

建筑师却倾向于右翼的改良派。这多少解释了他为何在建筑语言上毫不矫饰，一如他钢铁游泳池的先锋基因；而在组织上如此重视公共空间的吸纳，一如“六八学运”后的欧洲政治。

## 大与小

2011年底，我从阿姆斯特丹一个左翼色彩浓郁的社会住宅论坛，飞往正在“右转”的哈瓦那考察古巴正在进行中的市场化实验，一周后又来到纽约“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大本营祖孔蒂公园。尽管公园一角的摇滚乐队令人不禁联想起嬉皮年代，但公园乱中有序的面貌还是让我相信这更多是一场雅皮运动：各色帐篷里分配着救济餐厅、义务门诊、人力发电站、宣传品制作点，左翼理论著作堆满临时书店的摊头，马克思的幽灵似乎正在将女性主义、同性恋运动、环保运动等亚政治组织重新捏合成“99%”的统一战线。前来会面的是我在荷兰论坛上认识的一个建筑师，他正作为左翼运动的领袖之一组织全美的学生罢课。在和他讲完我过去十天在西半球“左转右、右转左”的见闻之后，我们谈起了老库。我说祖孔蒂公园的拥挤、多样性和活力，几乎就是没有摩天楼的“曼哈顿主义”了；他说他曾因《癫狂纽约》而对老库推崇备至，“现在不了，因为他越来越多地只为大客户工作”。这时我们正走到华尔街，街上已经围起了长长的栅栏，一路都被荷枪实弹的警察把守着。想起金融家族罗斯柴尔德也是OMA近年大客户之一，我理解了身边这位朋友对老库的诟病。

20世纪的一系列现代建筑运动大都是战后重建的产物：一战后苏联的构成主义和德国的包豪斯，二战、朝鲜战争后日本的新陈代谢。

建筑师的“唯物主义”不仅是格物营造，更是这个职业作为文化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依赖——建筑师通过空间改造社会的思想，往往要通过大规模建设来实验：印巴分治后的昌迪加尔新城计划成就了柯布西耶，巴西迁都腹地后的巴西利亚新都计划成就了尼迈耶尔；但倒过来，大规模建设却未必给建筑师的社会理想留有余地：构成主义和包豪斯分别终结于斯大林和希特勒以国家意志为主导的大规模建设；国民政府时期中国海归建筑师们的本土现代建筑实验则终结于1952年后以设计院体系为主导的战后重建；而库哈斯在《癫狂纽约》中回溯的“曼哈顿主义”，则终结于战后美国在全球大规模推广的“国际主义风格”。决定历史的条件不变，历史就会重演：如果说“曼哈顿主义”的经济基础是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渔翁得利、纽约取代伦敦成为世界金融中心，造就“拥挤文化”上层建筑的是旧世界资本在新世界的集聚，那么今天，上世纪的“新世界”已然作旧，资本正随着全球经济重心的东移而转向东方的“新新世界”，“拥挤文化”是否将在资本雄厚、人口密集、社会加速多元化的亚洲城市及其建筑中得以再现？这正是库哈斯对亚洲的兴趣所在。

对于库哈斯而言，“大”更多是内容的质量而不是空间的体量。大质量需要大体量，但大体量未必意味着大质量，没有丰富的“小”，就无法成就有质量的“大”。在OMA为香港西九文化区提交的方案中，

40公顷的基地被规划为3个次中心村落，而每个村落则进一步被分解为若干小尺度建筑。这种“化大为小”的策略再现了他在《癫狂纽约》中暗含的辩证法，“小空间”以化整为零的方式抵制着单一开发商的垄断。然而，这一可能为香港小微型创意企业提供空间、最终为香港的单一经济提供多元化出路的方案，却意外地在终审中落选，特区政府被土地财政和地产霸权的程度可见一斑。“大”在这个全球最拥挤的城市的失败，不仅意味着“拥挤空间”未必有“拥挤文化”，也显示了经济垄断和政治极权在取缔差异、抹杀个性上的一致性。“曼哈顿主义”之所以终结于“国际主义风格”，只因美国作为一个战后新兴霸权，急需在建筑语言上建立一种通用的“普通话”，以配合它在世界范围内的强势渗透。联合国总部对“国际主义风格”的确立，与苏维埃宫对“帝国新古典主义”的确立，在政治涵义上如出一辙；而以美元霸权和军事基地为前提的马歇尔计划，与斯大林的“共产国际”或莫洛托夫计划，本质上也遥相呼应。这就是为什么在《游泳池的故事》中，抵达大西洋彼岸的构成主义先锋们被纽约的循规蹈矩吓着了，误以为共产主义传到了美国。



大与小的辩证法的另一面是“化小为大”。在不到2200平方米的纽约PRADA旗舰店中，库哈斯吸纳了剧场、学校和博物馆。在此反转了购物场所将多样性人群单一化为消费者的过程，而是通过场所的复合化、将消费者还原为“反异化”的观众、学生、研究者；其“角色反转”的概念，来自库哈斯在哈佛带领的研究项目：购物。普拉达和哈佛的这种互动，显示了库哈斯在“大客户”之间借力、化被动为主动的太极技巧：作为六八一代，他选择的反叛策略不是闭门造车

或螳臂当车，而是介入车辆驾驶室，和驾驶者一道优化车辆行进的方向。这不仅是植根于第二国际自我修正传统的策略，也是对建筑师及其所处世界知己知彼的判断。无论是西九龙的文化政治、普拉达的商业战略，还是哈佛的教学取向，都是库哈斯默认为的“马太效应”的一部分：大的资源能带来大的影响，而大的影响则能带来更大的资源，而库哈斯的野心在于介入并借力于这个大循环，用“小”的活力增加“大”的质量，以证明被权力和资本主导的空间，可以不是苏联共产帝国主义的极权空间，亦非美国国际主义的通用空间，更非“只有子系统、没有上层建筑”的垃圾空间，而是将“顶天立地的大”和“铺天盖地的小”结合起来的小生态。

## 破与立

因为CCTV，老库每隔几个月就会来一趟北京，每次来都会去工地看看，有几次夜深了，仍会一个人在夜色里绕工地步行。一晃十年，CCTV终于竣工。他约我去参观，一面介绍一面喃喃自语：“奇迹，奇迹。”晚饭后，我们驱车经东三环向南回他下榻的酒店。CCTV缓缓从前方阴沉的雾霾中隐现出来，轻轻地低着头，一个不常被媒体注意到的角度，让我想起《癫狂纽约》中数次提及的《晚祷》。他从我身后的后座上俯身向前窥视，像窥视别人的作品：“某种程度上我更喜欢它在雾中的样子，还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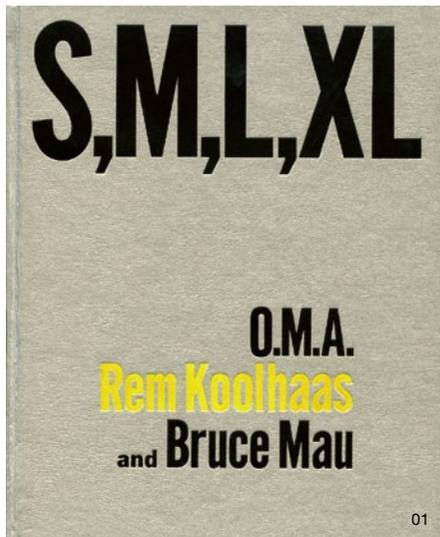
01/03. 普拉达基金会，意大利米兰，2015年建成 02. The Interface，新加坡，2013年建成 04. 波尔图音乐厅，葡萄牙波尔图，2005年建成 05. 艾瓦别墅，法国巴黎，1991年建成 06. 蛇形画廊临时展馆，英国伦敦，2006年建成 07. 西雅图中央图书馆，美国西雅图，2004年建成 08. Dee and Charles Wyly 剧场，美国达拉斯，2009年建成 09. CCTV总部大厦，北京，2010年建成

错，不是吗？”几乎是迫切地在等待认同，很少见他这样。我回头：“我因它而为北京感到骄傲。”老库点点头，不易察觉地说了声谢谢。他知道我并非在恭维，而我也知道他的感激也并非出于礼貌。几个月后，我把在北京机场拍到的一张机场广告照片发给他，主题是代表着“美国梦”的曼哈顿城市天际线，拼贴着帝国大厦、洛克菲勒中心和不复存在的WTC双塔，上空耸立着来自北京的CCTV，若隐若现地隐在雾中，似乎暗示着这个不以高度见长的摩天楼，在精神上对老库笔下那些纽约前辈们的超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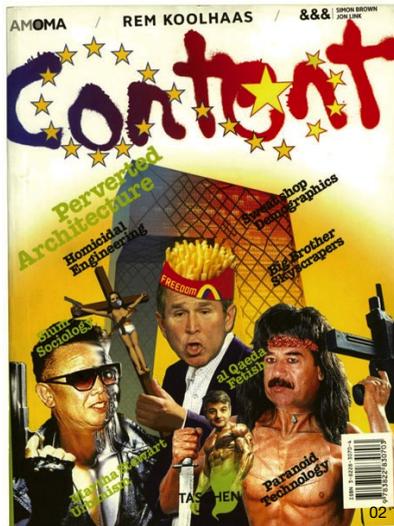
十多年前，库哈斯在WTC和CCTV中选择后者时，绝不会想到这个项目会在中国如此饱受争议。建筑界几乎因为对它的褒贬不一而分裂，民族主义话语则因其作者的西方身份而死灰复燃，出租车司机们为它起的别称则因民众的仇官情绪而脍炙人口（这种情绪在对CCTV大火的幸灾乐祸中达到极致），而与此同时，它又越来越多地和天安门、天坛、鸟巢一道，铺天盖地地出现在与北京有关的广告、电视剧和电影之中……在这样的舆论风暴中，这个历经十年建成的媒体之城，其复杂性却被扁平化和标签化；尽管大楼在设计中引入了一条公共流线以创造公众监督，但在其真正为公众开放之前，或公众真正习惯了国家机关对他们开放之前，他们更习惯用别名去调侃那些就在眼前却不能介入的一切。在一个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正经历着深刻转型的国度，库哈斯试图以一个

柔性多变的“大”扭转此前国家机关建筑刻板形象，以公共参与协调此前泾渭分明的“国家-社会”关系，然而在这个空间化的制度设计被真正使用之前，这种和解还只能是他的一厢情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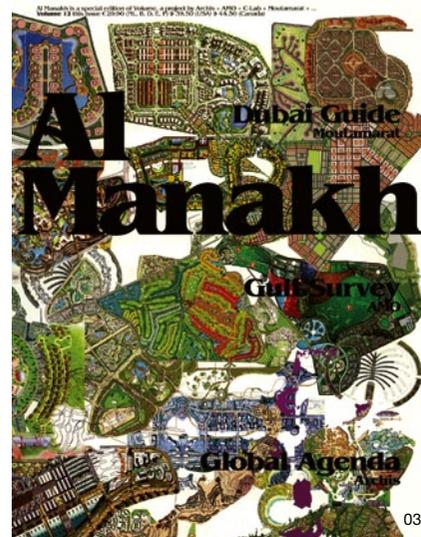
在后“文革”中国，随着富裕人群的扩大，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进入《搏击会》中令杰克失眠的私人物质生活，但泰勒·德顿式的精神反省尚未在他们中出现，更多的是公共空间中暴富者们目空一切的暴戾气息。而那些被排挤在社会边缘的底层人群，只能以阿Q式的嘻笑怒骂聊以自慰，以“犬儒式意淫”或“口头阶级斗争”作为他们在贫乏现实中的生存方式。这与《癫狂纽约》中的“偏狂批判法”（Paranoid-Critical Method）有种似是而非的联系：用理性的推导支持偏狂的臆想，同样是达利为贫乏现实发明的生存方式。库哈斯不惜笔墨地描绘“偏狂批判法”有双重涵义：一方面是对现代建筑的描绘——“建筑是它的创造者强加给世界的臆想……不可避免地是一种偏狂批判活动”；另一方面则暗示了一种处理贫乏现实的方法。他用钢筋混凝土来重新阐释达利的图解：“一团混着呕吐物的灰色液体，在最严格的牛顿力学计算下被钢筋加固；一开始无比绵软，突然坚固得犹如岩石。”在这个比喻中，疲软的，甚至令人失望的现实成了坚固岩石的必要成分，问题只剩下用怎样的理性去为之铸造钢筋。这不仅是“虚构结论”中暗示的“乐观主义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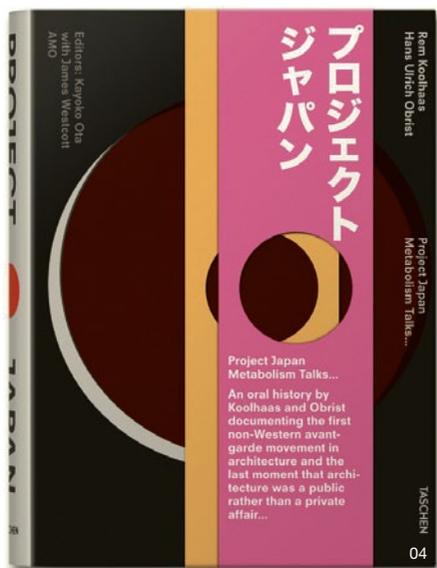
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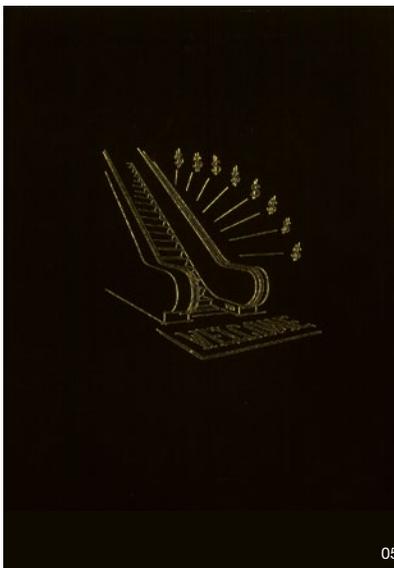
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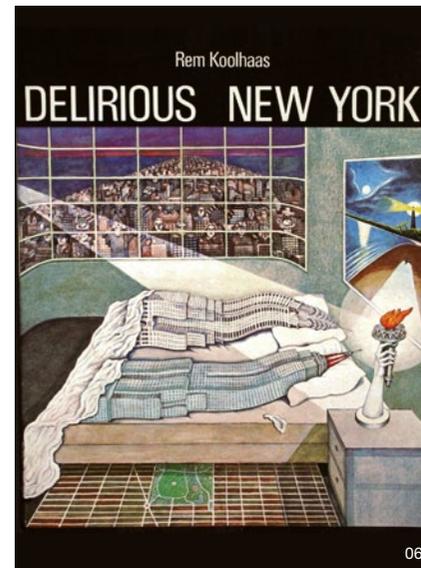
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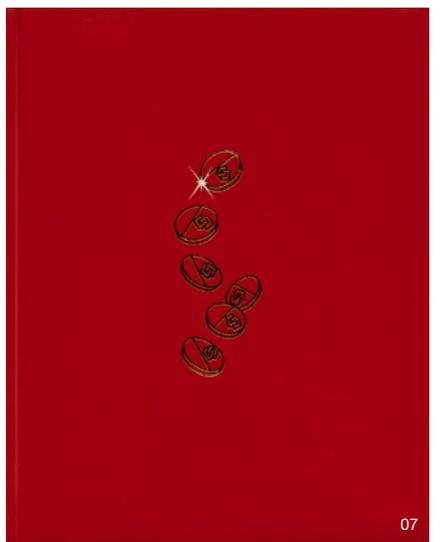
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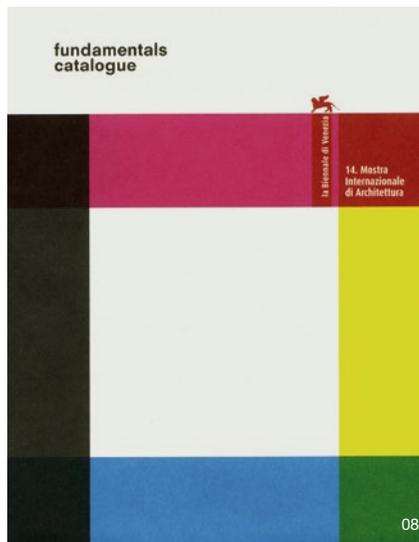
05



06



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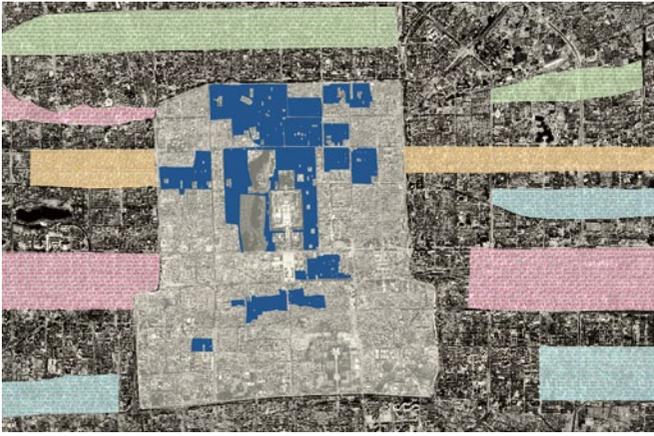


08



09

记者和电影编剧是库哈斯最初从事的工作，这对他的建筑事业产生深远影响，使得他始终能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去看待建筑。研究和调查是库哈斯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他建筑实践的土壤，图为库哈斯的相关出版物。左页：01.《S,M,L,XL》，1995 02.《内容》，2004 03.《AI Manakh》，2007 04.《Project Japan: Metabolism Talks...》，2011 05.《Project on the City II: The Harvard Guide to Shopping》，2001 06.《癫狂纽约》，1978 07.《Project on the City I: Great Leap Forward》，2002 08.《Fundamentals》，2014 09.《Elements》，2014 右页：库哈斯出版物内页



### EAST Saved by a Fortune Cookie

**Beijing's Challenge**

The new China Central Television Station will be located in Beijing's new 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 close to the intersection of Chang'an Avenue and the Beijing Road, and will be completed by the Chinese New Year of 2008. The project is located in the heart of an already densely populated area, with a total area of 90,000 m<sup>2</sup>. The 330,000 m<sup>2</sup> of space is to be divided into three main functional zones: a central zone for TV broadcasting and production, a central zone for news and information, and a central zone for news and information.

On the one hand, the site is a prime location for the new sta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 site is a prime location for the new station. On the one hand, the site is a prime location for the new sta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 site is a prime location for the new station.

In this sense, the site is a prime location for the new station. On the one hand, the site is a prime location for the new sta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 site is a prime location for the new station.

The station is a prime location for the new station. On the one hand, the site is a prime location for the new sta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 site is a prime location for the new station.

The station is a prime location for the new station. On the one hand, the site is a prime location for the new sta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 site is a prime location for the new station.

### Guangdong Villas

新的篇章 新的辉煌

Water Material

A New Chapter, A New Contribution



### TYPE "0" Escalator

...for the large, heavy duty installation

THIS IS THE inside story

**BASIC DATA** - for architectural study only

Model	0100	0100	0100
Width	1000	1000	1000
Speed	0.5	0.5	0.5
Capacity	1000	1000	1000
Power	1000	1000	1000



### AMO ATLAS

1999

1,514

AMO ATLAS

AMO ATLAS

AMO ATLAS

AMO ATLAS

### Necessary Modernism

1959

1969

19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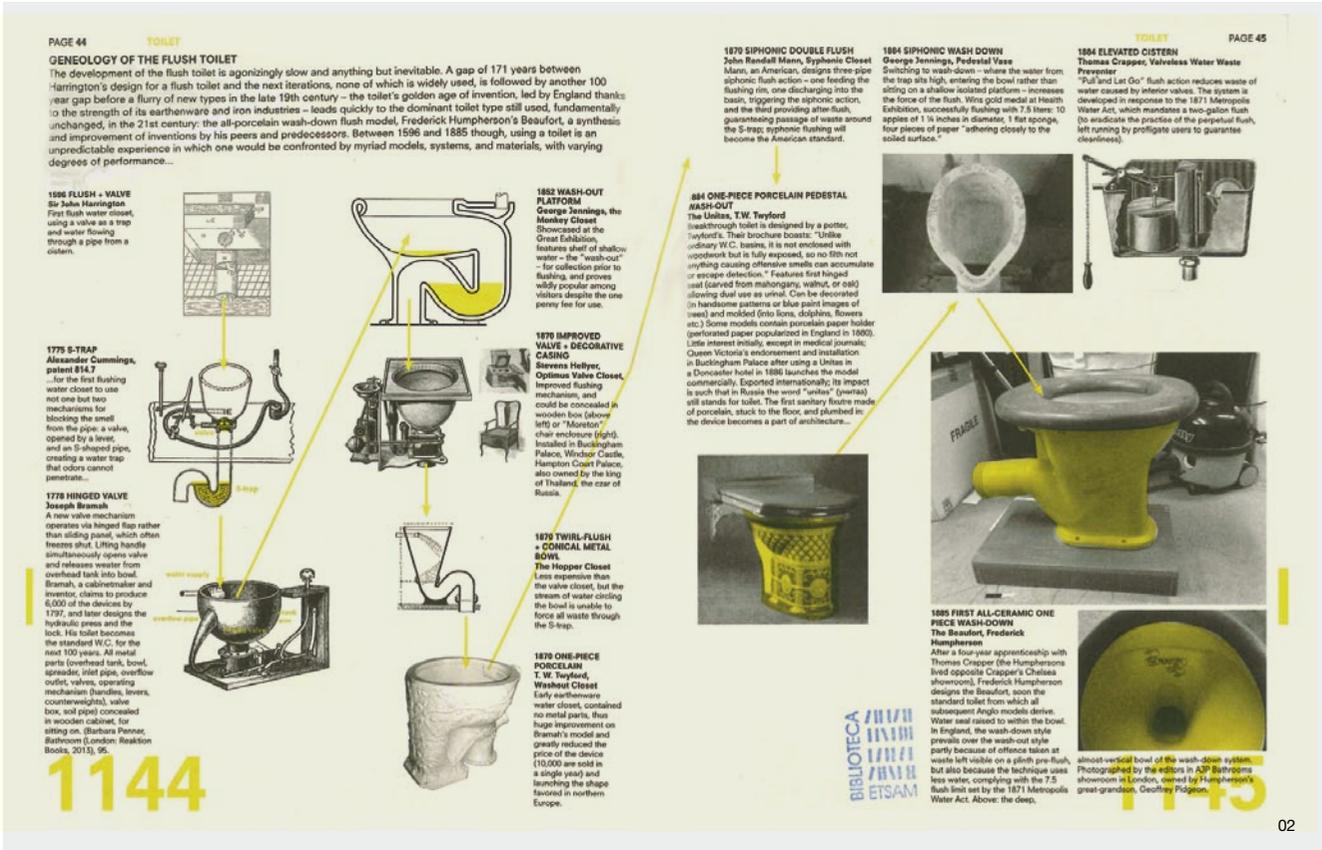
1989

1999

Necessary Modernism

Necessary Modernism

Necessary Modernism



01/03. 《内容》是9-11事件后库哈斯对建筑与城市的研究成果，书中包含不同撰稿人的文章，包括新闻记者、医学作家、文艺批评家等。全书以杂志的排版和结构呈现内容，大量运用漫画、拼贴、翻拍、地图、图表分析等手法，库哈斯甚至还加插广告，欲以低价格让这本学术专著成为畅销书。图为《内容》内页 02。2014年，库哈斯受邀为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策展人。展前两年，他将建筑分为门、窗户、阶梯、阳台、天花板等15种基本元素并逐一探究，回溯了建筑演进和衍生的过程。这也成为2014年双年展主题“Fundamentals”的破题之作。同年，相关研究成果集结为《Elements》出版。图为对厕所的研究

胜悲观主义”的逻辑来源，也是作者向未来建筑发出的一个积极讯息。《癫狂纽约》写作于一个现代建筑已经被宣判死亡的年代，该书不同于先前现代主义著述的核心，在于揭示了人类理性活动的非理性本质。正是在这种非理性中，先锋建筑师们将不得不面对“塑料美杜莎之筏”这样疲软的现实；也正是钢铁游泳池将之切成两半的瞬间，一种新的、岩石般的现实产生了。多年之后，库哈斯用来自圣彼得堡的“古根海姆赫米塔兹博物馆”的钢铁盒子，“像尖刀切开牛油般”，切入了拉斯维加斯威尼斯旅馆的塑料肌体，钢铁与塑料、尖刀与牛油共同构成了一种新的现实。

库哈斯很少做价值判断，却擅长有关褒贬的矛盾修辞法。“偏狂批判法”具有批判性和建设性的两面：其批判性在于给所谓的理性证伪：一个被“打假”的钢筋使得混凝土的现实回到了绵软状态；其建设性则在于为之重塑钢筋。《癫狂纽约》之后，库哈斯用这种矛盾修辞法写作了《普通城市》和《垃圾空间》，不明就里的读者会将之理解为一种对千篇一律和混乱无序的鼓吹，熟悉他写作语法和思想上下文的，则不难看出他是在系统化地吐槽全球化和无序民主下的空间秩序。和《癫狂纽约》一样，他的每一步写作都是在为下一步实践奠定台阶，用记者身份“破”，用建筑师身份“立”：用CCTV使北京不那么普通，用钢铁盒子使拉斯维加斯不那么垃圾。

## 根与叶

老库又来到北京，带着他威尼斯建筑双年展总监的最新身份。午饭时他向我们介绍了策展思路，但就如何把这次展览的主题“Fundamental”翻译成中文，在座的几位中国人未能达成统一。下午，我带他去往京郊的一个大木工作坊，为他在中央馆的策展做准备，在那里他要把全世界的历史建筑构件做集合展出。院子里正在复原一个木结构的老宅，主体构件都是从安徽乡下拆运到北京的。“看，这是一栋一百年前的房子。”我对老库说，“但属于一百年前的只有木作本身，剩下都是‘现代性’。如果只展这些构件，那么Fundamental就应译成‘基本’；但要展它的预制、框架、院宅和园林体系，就得译成‘根本’。构件可变，但体系不变。中央馆的Fundamental和中国馆的Fundamental，译成中文，区别就出来了。”老库嗯了一声：“看来你们中国馆有自己的故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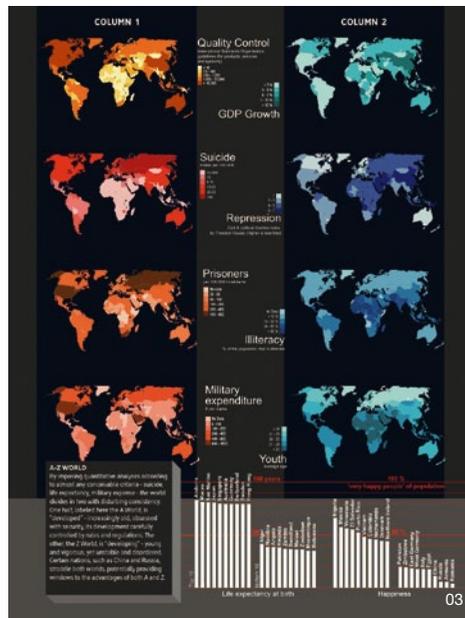
十年前，我发表了第一篇有关库哈斯的评论。由于OMA在荷兰语中意为“祖母”，我有意在这家大众媒体上模仿阿尔莫多瓦的一部电影，将标题定为《关于库哈斯的一切》，希望普通读者读到“一切有关库哈斯的故事”，而专业读者则读到“库哈斯如何看待‘一切’”。正如爱因斯坦曾说的：你不可能用造成问题的思路去解决问题。用学院派建筑学的思路去理解面向“一切”的库哈斯，只会问题重重。一年后库哈斯的新书《内容》（Content）出版了，他在书中所作的前言证实了我对他这一判断：“从建造的义务中解放出来，它（建筑）可以成为一种思考一切的方式……一种有关一切的图解。”这本被他定义为杂志的出版物中，他通过他的建筑师实践当回了记者，或者说他用记者的方式改造了建筑师职业，发掘了空间作为语境间、学科间通用语言的属性，使建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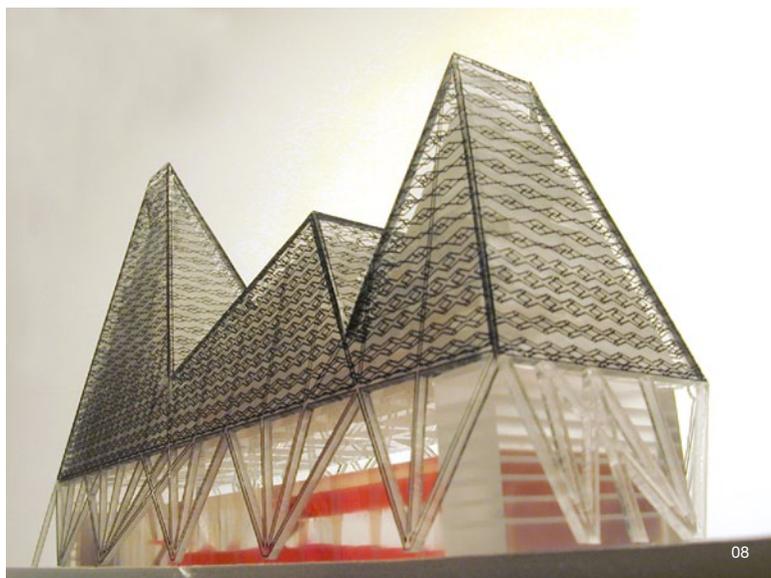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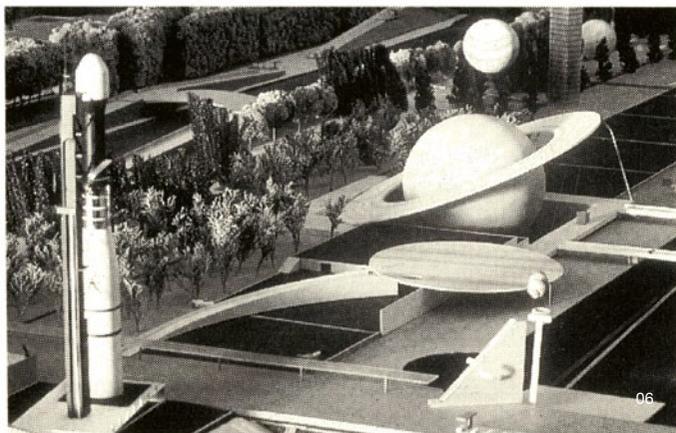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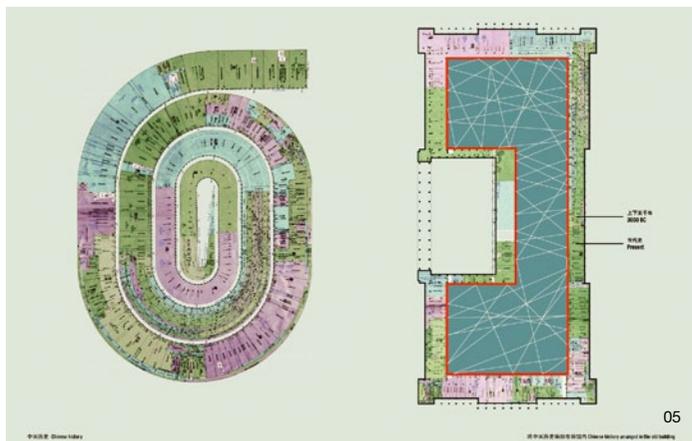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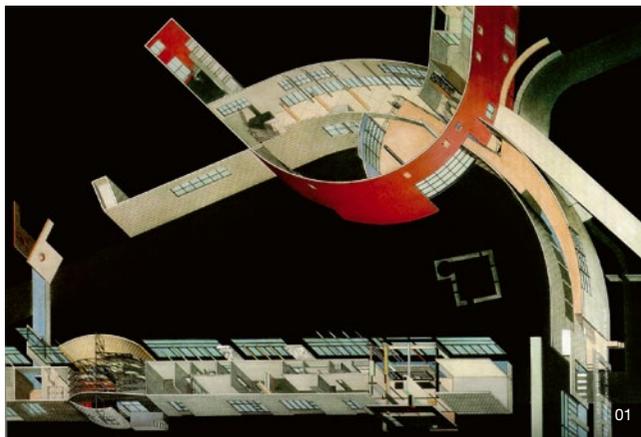
成为建筑师进入陌生领域的媒介。《内容》不仅再次发表了《垃圾空间》，而且明显地受到非纸媒语言的影响，被不无犬儒地设计成了充满刺耳噪音和信息碎屑的“垃圾空间”，其中描绘的反乌托邦场景是入木三分的，它接近中国作家刘慈欣在《三体》中描绘的一个科幻寓言：人类将有可能因为基础学科的锁死而陷入一种思想停滞、启蒙终结的状态，这令人类的一切成就如同泰坦尼克上最后的狂欢舞会、无根之木上的虚假繁荣。尽管我个人从不认为启蒙会真的终结，物极必反，思想的复兴会在未来某个混合着剧变、动荡和革命的时刻再次降临，但眼下，大部分人至多只能用“偏狂批判法”来为自己的无根之木寻根。

《内容》出版时库哈斯已年届六十，就好奇心和求知欲而言，他是年轻的，而就阅历和记性而言，他已是长者，这本海量信息之书似乎成了他“亢龙有悔”的转折点。七年后，他出版了有关日本新陈代谢运动的采访集《日本计划》（Project Japan），在该书前言中他一语双关地写道：“随着记性的衰退，视野是唯一的选项。”——既是对上世纪最后一场现代建筑运动的感慨，也是对他本人步入老年的感悟。我相信，如果某种东方的“慢”能够真正进入他的视野的话，那应该是比他年轻时在日本学到的一套密集而严苛的日程表更有价值的东西——一种抵御异化的古老哲学。这种哲学的根本，同样来自于一种“有关一切的图解”，一种“立象以尽意”的全局视野，一种在东西、左右、大小、破立等意象间建立起的方位、取向、分形、生克的关联体系，并以这种体系为“常”，为万世之“变”立法。新陈代谢（Metabolism）一词原为日语，翻译成道家术语即“生长收藏”，而在这四象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国古建筑体系，本质上自然是新陈代谢的。尽管经历了近代礼失而求诸野的动荡，中国文明将在更长的历史图景中显示出“守正出奇”的轨迹，而相比之下，西方文明则是一个“出奇归正”的过程，库哈斯从“记性”到“视野”的转变，以及从“癫狂”到“根本”的回归，都属于这个过程。

在2000年普利兹克奖授奖会上，库哈斯用几乎危言耸听的方式表达了他对建筑学未来的视野：“如果我们不……重新将建筑作为视作一种思考古老问题的方式，建筑学或许将不会持续到2050年。”可以说，库哈斯长达半个世纪的工作为这个行将就木的学科作为“思考古老问题”的存在延长了寿命。建筑学面临的威胁是多方面的：学科内部的思想停滞，学科外部新兴交叉学科的竞争，以及虚拟空间对现实的改造。我想，库哈斯视野中的建筑学，将通过“大数据垄断人类”的“角色反转”而得以重生：借用互联网在跨界交流和知识生产方面的优势，强化被边缘化的物理现实，重建古老的通识体系。愚者察异，智者求同，在互联网将“一切”都呕吐到人类面前时，我们的工作就不再是在搜索引擎的“一切”中盲人摸象，而是从眼花缭乱的“一切”回归到“一”。在这个方向上，他在有生之年还能走多远我们不知道，但这并不重要，像他常说的：选择建筑师职业不是为了让自已自由，而是让别人自由。

（原文刊载于《城市空间设计》杂志第32期《OMA在中国》，原文15700字，本文为作者按本刊篇幅所作节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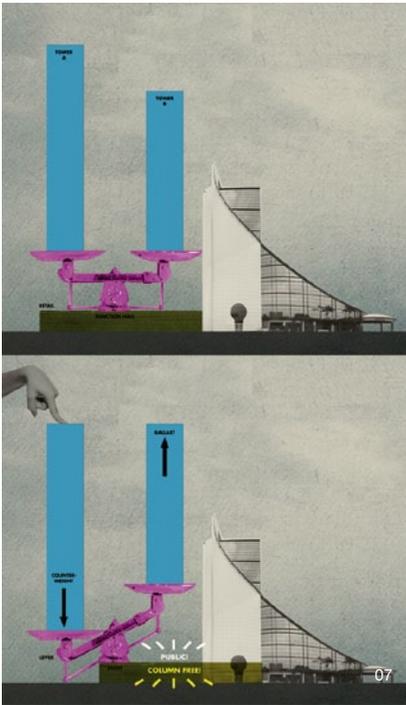
库哈斯很长时间被称为纸上建筑师，拥有众多未建成项目。但他认为，无论已建还是未建，成功还是失败，都会对社会及建筑师个人产生相当的影响，有时未建的影响或许更加强。图为库哈斯未建成项目。01. 爱尔兰总理官邸方案，爱尔兰都柏林，1979 02. Hyperbuilding方案，泰国曼谷，1996 03. 库哈斯在加沙双年展上对迪拜城市分析的演讲配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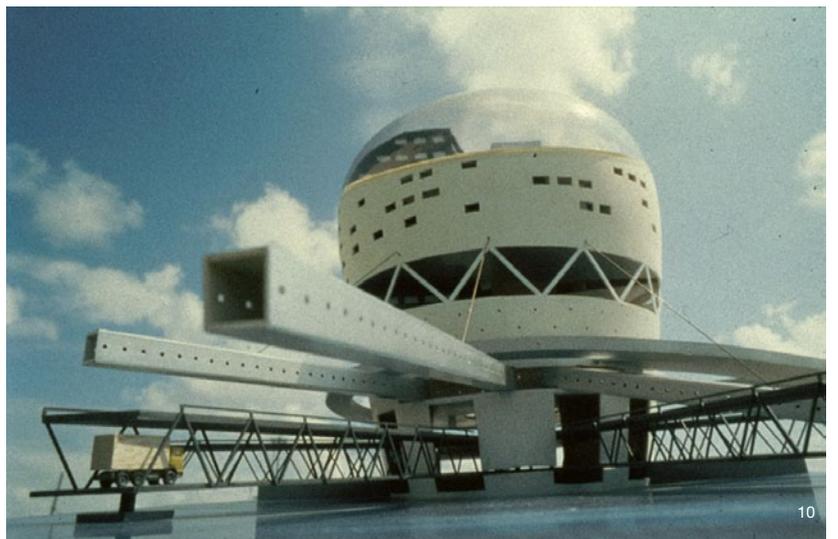
03



04



07



10

2009 04. 425公园大道建筑方案, 美国纽约, 2012 05. 中国国家博物馆方案, 北京, 2004 06. Parc de La Villette项目, 巴黎, 1982 07. SSI Towers方案, 印度尼西亚, 2013 08. 欧洲央行方案, 德国法兰克福, 2003 09. 保时捷大厦方案, 迪拜, 2009 10. 泽布吕赫深水码头方案, 比利时, 1988

# HISTORY IS THAT EVERYTHING IS NEW

## 历史就是，一切都是新的

Q: 新视线 A: Rem Koolhaas

你在世界范围内有很多项目，也针对项目做了很多对本土文化的研究，让它能够更好地融入当地的环境。但我们看到你最著名的作品大都是“站出来”的，带有很强烈的OMA风格。那么你是如何平衡“站出来”与“融进去”之间的关系的？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嗯……我们有“站出来”的项目，也有很谦和的作品。事实上，在过去的十年、二十年间，世界各地有太多“站出来”的作品了。我可以给你看一些图片，因为如果所有的建筑都是“站出来”的，那么就没有真正“站出来”的作品。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试图做更谦和的设计，而有些时候，即便做那种“站出来”的项目，也是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站出来”。

又比如，我们在鹿特丹的一个项目，坐落在一片非常宽阔的河面上，我们让它的体量能够与这条河的规模相平衡。再比如，去年我们是威尼斯双年展的策展人，我们特意跳过当代建筑，将焦点放在建筑细节和建筑历史等话题上，以此来表达我们对当代建筑地标泛滥这一现状的态度。

现在中国很多城市都有相似的旅游街，它们仿照古代的商业街打造，售卖着和其他城市的古街景点一样的纪念品。你怎么看新建筑和历史之间的关系？

我觉得这是一个范围很大的话题。关键在于，什么是历史？很多人会联想到著名的作品、特殊的事件等等，但有时候，某条街上的一次军事阅兵，也可以是历史，只是你没有亲眼目睹它而已。如果你看鹿特丹的历史，它曾经在二战中被德国人炸成了一片废墟，所以曾经的历史就不见了，看不到了，但这其实就是历史本身，历史就是，一切都是新的。我很高兴我们不用重建老的东西，我认为历史就是一切从新开始。比如Prada大楼，它有一部分是新的，一部分是旧的，它不是一个非常漂亮或者非常特别的旧工厂，但人们会知道它在很多年前只是一幢非常普通的建筑。其实我们也尝试过好几次，我们曾经在北京争取过一个旧建筑修复的委托项目，我们仍然希望能做类似的项目。

这里有些书是我们自己做的，讲的就是我们怎么看待历史建筑保护这件事情，也为中国的相同课题提出了一些建议。比如针对北京的历史建筑保护，我们就提出了一些不同的想法……没有建议一定要保护紫禁城或者那些漂亮的历史建筑，而是建议以机械的方式、不加思考地保留城市中的几个点，这样人们就不仅仅可以看到古老的北京，还可以看到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和其他时代的北京，所以说，这是一种现代的保留方式，不是要去保留独特的东西，而是保留平常的东西。

我们在这本出版物里写了很多的历史，有好的也有坏的，有希特勒之类的人物，通过这种包容，我们想要解释欧盟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同时保留各个国家的个性。谈到欧洲，它是联盟的，但事实上很多人不喜欢这样的现状，人们还是想保留各自的不同。所以你看我们设计的欧盟会旗，每一个国家都有独特的体现方式，保留了自己的个性，并

且整面会旗看上去也非常醒目。

在这本书中，你可以看到我们有研究过俄罗斯的面积，它是一个很大的国家，这个是莫斯科，这是山……还有，我们研究的不是城市，而是乡村，基本上参观了俄罗斯所有的乡村和类似的地方，尝试着去了解，比如，一些区域俄罗斯和中国人合作，受到了很多中国的影响。这是一个完全非商业性的项目，我们只是单纯地想要通过这种研究来了解世界，了解世界的贫困等等。

OMA事务所的业务性质是怎么构成的，在社会性项目中，你们会着重哪些部分？

我们做过一些社会性的项目，比如我曾经研究过非洲的一些城市，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我第一次去了非洲，做了一些研究，提出了一些想法；再比如，我们也去过中东的一些贫困地区，也尝试过进行一些干预……比如如何在不动摇的前提下做一些改善。我们所有的项目中有30%是私人商业项目；差不多40%是公共项目、政府发起的项目，还有差不多10%到20%是我们自己发起的、非商业性的项目，是更偏社会性或政治性的项目。

作为一个社会主义支持者，你觉得这个体制的发展趋势在当下是怎样的？

我永远都会投社会主义的票。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市场经济已经成为西方社会发展的动力，中国也是。当然，单一个人或者一个项目是没有办法和这个趋势抗衡的，但我觉得事情会变得非常有趣。公愤，你知道什么是公愤吗？就是人们对某件事情的反对和抵抗。从另外一种角度来说，这是一种波状运动，像这样（在纸上画波浪线条示意），在这里，每个人都非常高兴、每个人都会变得有钱，现在，我们没有那么高兴了，因为社会出现了不平等，有些人变有钱了，但有些人还是很穷困，然后这个波状运动会继续重复……

也许这已经是你第无数次说起CCTV大楼这件事了，我们上班的时候会看见它，在各种高楼中，它仍然还是一个异数。

谢谢。我们在开始参与这个设计竞赛的时候，按照当时的规划，项目所在的区域都是要建高楼的，所以我们想，不如做一个有趣点儿的高楼，简单、比其他的高楼要低一些。所以说我们没想做一个超越其他建筑的摩天大楼，我们想做的反而是一个矮一些的，但更具有场域感的建筑，这是其他的高楼所没有的特质。CCTV大楼为这个城市制造了一片开放的空间。同时，我们也想打造出一种与众不同的建筑形式。从某些角度看，它像字母“Z”，换一个角度，它又像字母“O”，所以从不同的位置观察这座建筑，你会看到不同的形状，这种变化也是很重要的。我们设计的不是一个简单的、单纯的地标，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建筑。

为什么会对中国感兴趣，它的复杂性总是令人感到刺激？



01

01. 2014年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主展馆“建筑的元素”现场，各种形式的窗户 02. 库哈斯设计的Prada秀场

我觉得哪里都很复杂，中东很复杂，俄罗斯很复杂，欧洲更是非常非常复杂。我觉得当下的世界正在经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时期，因为这时候没有人觉得自己的国家是完美的，于是才会产生真正意义上的交流，因为那种傲慢不存在了，中国人不傲慢了，欧洲人不傲慢了，美国人也几乎不傲慢了……我一直试图做一个乐观的人，这种看法就能证明我的乐观。

很多建筑师都会希望自己不光作用于一个建筑，而是更多作用于一座城市的结构与功能，如果让你来设计一座城市，你会首要考量哪些部分？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甚至50年代的时候，人们还在讨论如何建设新的城市，而且某些情况下，确实有很多城市都建起来了，也许中国目前仍然在建设新城，但在其他国家，几乎没有人有这个精力去从无到有地建造一个城市，但也许这也不是件坏事，因为这样你就不会犯城市尺度上的大错误。我们目前更多都在做单体建筑，而不是一座城市。比如说，如果你把每个人的地标作品都放在一座城市里，就会显得比较枯燥无趣，所以在迪拜，我们设计了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大楼，有一种“反地标”的意味。

你的身份很难简单定论，那么可否理解为你会通过建筑这件事，来表达或试验自己的一些观点，或者是不满。

我并不觉得我有通过项目来刻意表达我的观点，这是我参与不同社会环境的一种方式。所以，这不是在表达观点，而是一种参与形式。比如说，有些西方人一直都会说伊朗不好、中东不好……西方人总是有些所谓的观点。但我却很想和中国合作，和伊朗合作，和俄罗斯合作，所以我并没有在表达观点，但这不是说表达观点是错的，而是说我想要的是探索更多合作的可能。

我们这一期的主题关于荷兰，一个最显著的特质是，一群小地方的人拥有着卓越的创造力，能不能谈谈你所理解的荷兰精神？

就我个人而言，我不确定我的东西能不能算是荷兰精神，在我小的时候，八岁到十二岁之间的几年，我住在印度尼西亚，我觉得相比于荷兰人的血统，那几年的经历对我的影响更重要，因为那是我第一次在亚洲生活，我非常喜欢那段时光，对我的人生有非常重大的影响。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我逐渐对跨文化交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声名上，你和乔布斯有些相似，业绩显著而不缺传言和诟病，你怎么看？

我觉得乔布斯是一个坏脾气的人，但他被神化也是很诡异和奇怪的……因为要管理一个400多人的公司，你不能是一个讨人厌的人，因为你需要培养人、尊重人，你需要鼓励他们创造，你需要创造好的工作环境让他们施展才能。一个讨厌的人是没法做到这些的，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名人效应会让很多东西被扭曲，这就是为什么我之前在美国，又回到了荷兰。因为荷兰这个国家没那么多的名人崇拜，所以或多或少的，你都可以活得更寻常一些。

有人告诉我们，你的生活很节制，像修道士一样。

我才没有像修道士一样生活，不过我每天都游泳，我和Petra生活在一起，你们昨天采访过她了？我还有一个孙子，会接他放学，我的生活一点儿不像修道士，那也是谣言。

请为我们推荐荷兰的某处。

有个地方，从鹿特丹开往阿姆斯特丹的高速公路的一段，在中间段有个拐口。往东边拐去，一边是16世纪中期的景观，在另一边，是21世纪的城市高楼，不同时期的荷兰景观交错在一个路口，非常有意思。

（内容待续，更多库哈斯采访请关注《新视线》12月刊）



02



在2000年德国汉诺威世博会上，MVRDV设计了荷兰国家馆。整个展馆由“屋顶花园”“雨林”“森林”“根”“园艺花园”和“沼泽沙丘”六种景观叠加而成，并且有自给自足的风力发电系统和水循环系统，成为是年世博会最引人注目的建筑

# MVRDV

## 问题工厂里的玩心

撰文\_2话不说 采访\_李驰、余非 翻译\_olaCola、李驰

MVRDV曾有一个构想，要在摩天大楼般的农场里养猪。

按照雅各布的规划，每座塔楼高达622米。其中，每头猪都有舒适的卧室，可按时洗澡和进食，房内还种着苹果树，提供苹果作为猪的点心。猪的排泄物则由专门装置收集到大楼顶端，一部分净化后成为苹果树和猪城内绿化的肥料，另一部分经过化学处理产生热能，为整座大楼提供暖气。对了，楼顶还有露天渔场，可提供部分猪的饲料。

只有地狭人稠的荷兰才能孕育出这样胆大包天的想法。荷兰面积只有两个半北京大，但它是欧盟最主要的猪肉出口国。如果全面采用有机饲养——（猪饲料使用100%的谷物），荷兰75%的国土面积都将用来种植谷物。竖向集合农场正是MVRDV提出的解决之道，这个想法颇有些浪漫，除了解决土地问题，他们还精心给猪构建了快乐的成长氛围。“猪很聪明，如果它能保持愉快的心情，产出的肉也会更加鲜美。”

MVRDV是当今荷兰风头正劲的建筑事务所。1991年，三位年轻人韦尼·马斯（Winy Maas）、雅各布·凡·里斯（Jacob van Rijs）和娜莎莉·德·弗里斯（Nathalie de Vries）合作参加德国一项建筑竞赛获得第一名，之后，他们决定共同成立建筑事务所。事务所的名称即取自于这三位建筑师的姓氏。

如同他们曾经的老板库哈斯（马斯和里斯都曾在OMA工作），在有限的土地上做更多事情，一直是MVRDV感兴趣的问题。库哈斯曾在1972年就对大都会的拥挤文化有过阐述（《癫狂纽约》），“人口数量的增加和土地资源的稀缺必然导致高密度的建筑学策略”。而未来二十年内，人口数量预计将超过八十亿，估计有五十亿人将生活在城市环境中。荷兰填海造地的领土局限、开放包容的社会制度以及库哈斯的思想余荫共同催生了MVRDV的“密度实验”，这成为他们建筑风格的核心思想之一。

在2000年德国汉诺威世博会上，MVRDV借此理念设计了荷兰国家馆。整个展馆由“屋顶花园”“雨林”“森林”“根”“园艺花园”和“沼泽沙丘”六层叠加而成，暴露在外的螺旋楼梯将其包裹成一个垂直的“景观三明治”。人们自上到下，体验了不同的荷兰景观和自给自足的生态循环系统，第一次意识到了向天要地的可能性。

这也反映了他们对密度的追求并不是城中村似的扩张，而是寻求某种最合理的形态。多面向的研究成为其设计的出发点，基于计算机技术的数据调查是他们最重要的研究方法。其数据体系除了常规的参数外，还包括能源、气候、收入、政治、人口流动、宗教等包罗万象的参数，然后再把它们通过计算机转换，绘制成图表供建筑师参考，这便是其“数据景观”（Data-Scape）的概念。此外，他们还进行了最大化（Farmax）、宇宙城市（Universal City）等研究项目，甚至在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内设置了一个非营利的科研教育机构——问题工厂（the why factory）。这些工作为理解建筑呈现了更多的方向，成为他们的设计手段，也常常导致了其建筑外形的大胆乖张。但**单纯谈建筑形式对**

**MVRDV没有意义，形式只是冰山一角，隐藏在水下的建筑与社会的关系才是影响建筑的真正因素。**这也解释了为何MVRDV的房子并不像扎哈·哈迪德和弗兰克·盖里等有一贯之的建筑美学。

多元包容的荷兰历来是感性与理性并存，有人认为MVRDV在理性上走得过远，但不妨想想他们给猪城设计的大阳台——让猪们享受阳光之余还能俯瞰景色，来自另一维度的评价是，玩心过重。当建筑面向的问题不那么紧迫时，他们不介意把一个建筑的立意放得特别简单——让人开心。在为Didden家族扩建住宅时，他们只是在现有的屋顶上加盖了三间形式最为简单的人字坡屋顶小屋，全部涂成蓝色。从城市某个制高点放眼望去，万丈丛中一点蓝，犹如城市的一个象征。在代尔夫特理工大学的“问题工厂”，MVRDV搭了一个巨大的橙色阶梯，会议室和办公室都隐藏在其中，使阶梯成为建筑内唯一醒目的元素。而靠后的学生逐步被移到室内顶端，俯瞰教授，这种感觉自不待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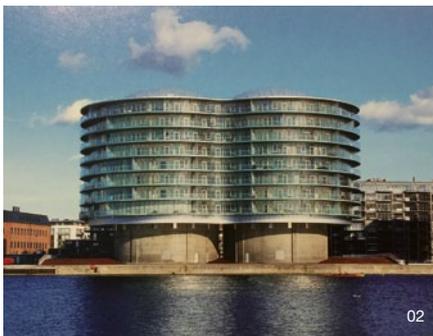
荷兰建筑圈里还流传着一个笑话：如果你想看荷兰最丑的建筑群，请搭车到鹿特丹Blaak火车站，甫一出车厢，首先是像极了锅盖的火车站雨棚，远处还有匪夷所思的立方块屋，被管道爬满的市立图书馆、铅笔状大厦，以及可以把铅笔收入其中的马蹄形笔筒——这便是MVRDV最新的作品——鹿特丹大市场，把它置于这群最具代表性的荷兰现代建筑群中毫无违和之感。

可以看出建筑圈对鹿特丹大市场并不感冒，但这并不妨碍其成为鹿特丹乃至荷兰最具明星效应的建筑物。MVRDV这次把市场和住宅结合在了一起，拱形结构既是市场的顶棚，也容纳着228间公寓，其下方是100余个摊位和各式商店。犹如教堂般的巨大穹顶看不到宗教壁画，而是喷绘了色彩明亮的香蕉、苹果等各种果蔬，民众完全臣服其中，感觉渺小又甘之如饴，给这座市场带来“食物界西斯廷教堂”的美誉。自去年10月开张，鹿特丹大市场共接待了超过800万名参观者，比参观埃菲尔铁塔的人数还多。

如今，MVRDV在至少15个国家有设计项目。中国快速城市化所带来的问题正是MVRDV一直在研究的。他们很早就主张保持城乡差异，反对城市的盲目扩张。他们认为，城市面积盲目摊大，农村耕地不断被占用，必然会造成巨大的交通压力和乡村环境恶化，如今，这些观点都被验证了。

但他们在中国并非一帆风顺。例如在广州火车站的项目投标中，他们想尽办法保护原址的鱼塘，让车站几乎所有的功能都建筑在鱼塘上空交错的“桥梁”上，而交叉形成的空隙让阳光洒下，保证了鱼塘的自然采光。方案最后未通过，对于中国的决策者来说，鱼塘填平了事。

有国内专家质疑MVRDV的设计过于乌托邦，并不符合中国国情。里斯回应：“在很多人看来，那些还没有成功的例子是乌托邦。但是我们的逻辑很明确，新的问题需要新的解决方法，也许是人们从来不敢想象的。如果连想象力都没有，那才是最糟糕的事情。”



MVRDV的建筑粗看姿态各异, 并无统一美学。但单谈建筑形式对MVRDV没有意义, 形式只是冰山一角, 隐藏在水下的建筑与社会的关系才是影响建筑的真正因素。01. 米洛德住宅, 西班牙, 2005 02. Frosilo双子座住宅, 丹麦, 2005 03. 书山街区建筑, 荷兰斯派克尼瑟, 2013 04. 松代町艺术中心, 日本, 2004 05. 新庄园, 荷兰, 2004 06. 鹿特丹大市场, 鹿特丹, 2014 07. 书山, 荷兰斯派克尼瑟, 2012 08. 清河大楼, 韩国, 2013 09. Arnhem 小屋, 荷兰阿纳姆, 1996 10. 迪登家园, 鹿特丹, 2006 11. 阿姆斯特丹癌症中心, 阿姆斯特丹, 2005 12. “问题工厂”大讲堂, 荷兰代尔夫特, 2009 13. “长椅”网球会所, 阿姆斯特丹, 2013 14. 平衡别墅, 英国, 2010 15. 鲜鱼口胡同改造提案, 北京, 2014

# LET'S TALK ABOUT CHINA 和MVRDV聊聊中国



## WINY MAAS: 别指责所有的政府官员，指责他们的领导吧

Q: 新视线 A: Winy Maas

荷兰国土面积很小，但有很强大的创意产业，尤其是“荷兰设计”近年来非常出名。MVRDV形成今天的设计风格，是否也与它的荷兰基因有关？

这是个很有趣的问题。近年来，荷兰的建筑业也开始了爆炸式的发展。荷兰人需要和外界竞争，而设计就是我们的武器。另外很重要的一点，荷兰人有城市规划和空间设计的传统，不可否认，我们甚至生活在一片完全由人类设计和建造的土地上，这一点对我们影响深远。我们同样重视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这一点在世界其他建筑事务所中并不太常见。荷兰国土面积40%-50%在海平面以下，这产生了大量的围海造田和水利工程，我们还要花巨大的代价来维护它，所以荷兰人也非常精确，这一点已经渗透在了荷兰设计中。

另外荷兰是由很多小型城市组成的小国家。从17世纪开始，荷兰就没有一个强大的集权统治，这样的民主环境给了人们一个态度，你需要且希望和别人交流。民主和透明的社会到最后成了整个国家的财富和传统，而这也成为“荷兰风格”的重要部分。这也是我们非常珍视并一直努力捍卫的。

你如何评价库哈斯执掌的OMA设计的CCTV大厦？

这种形势下，设计了一个雕塑性很强的、带有一个空洞体量的高层建筑，这很有创意。但在另一方面，这个超然体量下的空间是否真的有用，是否真的给人提供舒适的环境，建筑内部两条垂直流线之间是否能有效地沟通，这些我都不知道，我也不能评价。因为我不能进入建筑内部，我也无法感受其中的空间。它也许可以保护你，给你提供安全的空间，但是不管怎样，我还没机会感受。

前一阵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达了“北京不需要这样奇奇怪怪的建筑”的观点，所以你会同意？

然而并不是。从大方面来说我觉得应该有一个开放的心态，应该给各种意见一个空间去表达。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希望看见更多带有实验性的建筑被建造出来，并且任何文化都给予它足够的表达空间。我也说过，我很有兴趣去让每个城市变得不同。我坚定地认为一个城市如果和其他城市拥有不同的面貌、不同的经济和不同的态度是好的。这样的话，我们在任何地方都可以讨论，这个城市可以是什么样的。我们不想复制任何建筑，我们研究考察世界上每个城市的特征，并且设计出与之相符的建筑。所以我们在威尼斯、在阿姆斯特丹都会做出不同的设计。另外，也有一个更大的背景，就是全球化、现代主义的背景下，每个建筑都对全球产生影响，而不是仅仅对它所在的城市街区。所以，如果我想做一个绿色建筑，或者一个社会性建筑，我可以在中国做，我也可以在荷兰做，因为这两者对于全球任何一个国

家都有价值。但是，如何把它们恰如其分地嵌入某个城市的某个街道中，这是个有趣的问题。

这就是我对你刚才提出的关于习近平主席观点的态度。其实我也有兴趣和他谈一谈，我想听他说更多见解。我甚至怀疑，媒体是不是太狭义地理解了他的谈话。我希望能和他谈20分钟，去弄清楚媒体是不是曲解了他的意思。

这让我想到了你在2011年左右和当时印尼的副总统交谈的事情，建筑师有必要和政客来沟通这些事情吗，他们真的能改变政客们的想法吗？

从某种程度来说，我也是个共和的人，我也想成为一个政客，我们的建筑也是有政治性的。当你希望以一个政客的方式来与这个城市和市民一起工作，就需要把城市和公众更多地联系在一起。所以与市长或与国家领袖交谈就很有意义，这可以让你弄清楚这个城市的特征，或是这个国家需要什么样的发展——他们会强调这一点。我们也由此知道，建筑师所具有的专业知识可以在政治、社会、经济等方面帮助到这个城市和国家，让他们遇到的疑惑变得更清楚。所以我一直相信和政客交谈是极其重要的。

中国有很多的项目，业主方都是政府。和欧洲政府相比，中国的政府官员可能对项目的控制力更强。那么你是如何与并没有建筑专业背景知识，但是又有很强的控制力的中国政府业主沟通的呢？你会妥协吗？

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官僚主义都存在。他们多少都在用自己的行动来维护他们的法律。你并不能期待那些官员恰好和你的观点一致。但是你的问题后面隐藏着一个更有意思的事件：如何才能让这个权力系统变得更加民主和透明化，从而不仅让我们的政府官员，同时让我们的设计师意识到风险的控制、资金的运作，用沟通让整个决策系统变得更合理。我们的领导者也需要乐于接受意见和批评，因为批评会让整个这个系统得到改善。我理解你的困惑，但是别指责所有的政府官员，指责他们的领导吧。

MVRDV是世界级的建筑设计事务所，在鹿特丹总部只有差不多100名员工，通常我们觉得当有条件获得更多项目的时候，公司应该扩大规模。在中国，拥有上千名员工的设计院并不在少数，MVRDV似乎不想这么做，请问这是为什么？

这个情况目前可能稍微有所变化，公司员工数量实质上还是在增长的。我认为像我们这样仅仅做设计的事务所——有的时候我们会漏掉许多扩大的机会。相比福斯特事务所，也许是世界上最大的建筑事务所而言，我们做建筑的态度是更加实验性的，而市场不会接受这么多的实验建筑，所以为了安全起见，我们不能像那些以市场为导向的事务所那样，拥有那么大的规模。何况，我们还需要和其他同样专注于创新实验性建筑的事务所竞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只做建筑设计中50%的工作，剩下的50%我们总是和当地的设计院配合完成。所以，如果要和那些做全套工作的事务所比较人数的话，你需要把我们的人数乘以2，那么我们就相当于一个大约拥有250人的公司规模了。所以如果你真的问我，我们想保持一个小的规模吗？我说不，我们需要更多的人来做更大的建筑，这也是更加成熟的表现，我的经



01. SILODAM公寓。项目所在地本是一座水坝和谷仓，被MVRDV改造成可以容纳157户的公寓楼，集住宅、办公、商业和公共空间于一体，满足了低收入群体的需求。阿姆斯特丹，2003 02. WOZOCO老年公寓。该项目是MVRDV完成的第一幢住宅。按照常规设计，该处地基不能满足100套单元房的需求，但MVRDV通过大尺度悬挑结构达到了这一要求。阿姆斯特丹，1997

验也告诉我应该要这么做。但是，千万别为了扩张而扩张——扩大规模是为了能胜任更庞大的项目、更高的品质要求和更快速的反馈时间，那才是现代建筑事务所所需要追求的东西。

MVRDV的公司规模不大，但你们却在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内建立了一个教学机构——问题工厂（the why factory），请问是什么原因让你建立一个花费很多精力但是却并不赚钱的教学机构？

你说得对，那很费时间。而且从总体上来说，做研究并不赚钱。但是我很喜欢这个机构，因为它有非常强的实验性，能够在这样的先锋机构里尝试一些想法简直是太棒了，有些事情你永远不能在一个普通的设计公司里完成。现在在问题工厂中所做的研究，部分资金来源于公共资金、工业基金或教育资金，而且远离商业行为。这也是为什么我要把这些研究放在公共系统内来做，而不可能放在公司内部来做。

在中国，我们经常谈论建筑设计需要“有意义”，它需要解决某一种社会问题，你怎么看？

用来解决问题的建筑方案本身有一个危险，那就是它无法同时提出一个问题，从而使得这个建筑仅仅是一个满足自身要求的建筑。所以在我们这个拥有巨大建筑数量的社会当中，我们需要有某些建筑不是用来解决问题，而是用来提出问题的，或捍卫某些思想，或开拓公众视野，或为了提供某种实验性经验。如果我们不做这样的建筑尝试，我们就不能开拓建筑设计的新疆域；如果我们只是为了解决问题，那么我们就无法预见在未来可能会出现的问题，永远都只能盯着那些已经暴露出来的问题。而提出问题的建筑则可以让人们意识到，原来有很多事情是可以通过建筑的手段来解决的。比如说，建筑师们最近设计了很多绿色建筑，但是其实这些绿色建筑需要耗费巨大的资金，以至于建筑本身的造价都不够了。而这一切仅仅是因为社会对你提出了这样的要求，需要你用绿色建筑来解决问题。为什么不忘记这些需求，做一个非绿色但是特别棒的建筑呢？这样我们就用在有限的造价内反复权衡建筑本身和绿色技术之间的平衡，从而有可能让建筑本身变得很好了。我们建筑文化的进步需要有更多这样的思考，而不是一味地用建筑去解决问题。



## JACOB VAN RIJS: 只要让我开心就行了，这就是建筑的功能

Q：新视线 A：Jacob van Rijs

建筑是很理性的行业，你们的作品却像一个一个的游戏。有人评论说你们是建筑行业里的喜剧明星，你怎么看待这个观点？

那是我们部分的工作，当然，本着负责的态度，我们也不可能只为了创造乐趣而设计。我们设计的乐趣在于创造不一样的东西，而不是做一些看上去和别的建筑差不多的建筑。

MVRDV进入中国市场已经很多年了，在这期间并不是所有的项目都顺利进行，比如万国城MOMA、南京第壹区等，对于你们来说，在中国盖房子，最可能会遇到的困难是什么？

当然是交流，因为我不会说中文。而且，很多时候我们不能把所有的人聚拢在一张桌子上讨论问题。不像在荷兰的项目，所有相关的人员会坐在一张桌子旁边，然后我们一起开会把问题解决；在中国，我们总是从一个会议转到另一个会议，有的时候讨论过的事情又会继续被提

起，所以我们永远不知道在中国人们是怎样决策问题的。但是最后，不管怎样我们还是慢慢懂得了中国项目运作的方式。在中国做项目，有有趣的方面，也有我们所不喜欢的方面。经过了在中国的十年之后，我们发现中国的项目在这两个方面都变得更好。中国在变得更好，我们也在改变。

中国有个说法叫“脑洞”，关于想象力的活跃和无边界，而MVRDV的设计经常会给人这样的感觉，你们是怎么让客户为你们的创造力埋单的？

他们必须支持。某种程度上，我们想出一个概念，客户则是和我们一起改进，这是做一个好项目所必须的。一些商业项目，比如一个别墅，建筑师往往有很好的想法，但是业主会说，这不是他喜欢的。所以这也要求建筑师需要找到和业主沟通的最好方式——但是这也不是说你应该全部听从业主的意见，否则往往会让设计变得乏味而无聊。让每个业主惊喜的同时还能让他们开心，这是最难的。还有印度的业主，我们有过这样的经历：我们作为建筑师，向业主询问项目的功能和他的要求，而他说，我的要求非常简单，你们只要让我开心就行了，这就是建筑的功能，我不知道我怎样才能开心，但是我雇了你们，你们就应该能做到这一点。

你们有一个项目叫“猪城”，计划在摩天大楼式的农场里养猪，这样暂时不可实现的设想，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影响现实呢？

这是我们第一次在中国展示的项目，这也是一个关于荷兰的项目，如何在有限的土地上做更多的事情，所以中国人也喜欢这样的故事。当时我们构想的就是，如何在荷兰这么小的国土面积上建造更多的生态农场，但是普通的做法都不能满足在小面积土地上做大农场的想法，所以我们就想到了竖向集合农场的概念。我们在四周创造了循环的食物供给系统，让其中的猪可以快乐生长。这是个浪漫的想法，当然也有人并不理解，甚至震惊和愤怒。也许这是个艺术化的想法，但是同时它也是具有实践性的，因为今天市场确实对猪肉有更多的需求。不过如果真的要建造的话，我们还需要把它改得更可持续一些，并且设计动物的仓储等。当我们展示的时候，很多人并不太理解全部，但是起码它能像镜子一样，让人们知道今天在这个领域发生了什么。

你们做的很多研究给了中国设计师启发。你能否谈谈对中国未来城市发展趋势的预测？

我们近期做了“中国山”的研究。那是一个充满了想象的研究项目，我们2009年在北京做了展览。那是个非常特殊的中国城市问题的解决之道，一种把城市和建筑结合起来的新途径，有可能会成为中国城市未来的趋势。我们大约计算了未来中国城市所需要供养的人口数量，以及这些人口所需要的生存空间，把这些数据加在一起，再结合中国山水的形态和自然景观，把城市做成了一种像山一样的形态，这是一种设想，也是一种预言或者解决方案。

请为我们推荐一处你喜欢的荷兰的地方。

我喜欢北方的岛屿。那里有非常特殊的地景，那里有海和巨大的海浪，和过去的时候一样。那里的海水和陆地有动态的平衡，每次我去那里，都会感受到不同。我会定期去那里，它像一个迷你的荷兰，非常小，但是什么都有。那里有生态农场，能源供给，像是个天堂。只是因为北方，那里的天气经常不好，比荷兰其他地方都冷，这是唯一的缺点。那里的风能把你的脑子吹得一片空白，从那边回来后你才觉得又能重新开始呼吸了。